

編主楷李蔣

書叢小战大次二

洲歐服征勒特希

譯模學蔣 著格尼許魯

版出局書代時大

M G

D851-60

5

種三第書叢小戰大界世次二：編主楷學蔣

HITLER'S AIM IN WAR AND PEACE

洲歐服征勒特希

著士博格尼許魯
譯 模 學 蔣



版出局書代時

中華民國卅九年三月七日 收



3 1764 4128 9

335.6 ✓
2707

01476

原序

德國的虛無主義革命已進入戰爭狀態了，也就是已進入世界革命狀態了。下面這篇文章是在戰爭爆發的兩年以前寫成的，我在納粹對外政策發展路線的輪廓中指出了兩大特點——達到最高權力和重訂世界秩序。事件的進程已證明國社主義決不是一個僅僅限於德國的純粹的民族運動。它激動了日耳曼民族的某些力量，並利用那些力量來補充它的動力主義；納粹政治的擴張運動甚至超越了主宰歐洲的觀念——這一運動的目標在掀起普遍的騷動，其範圍之廣，簡直令人難以相信。

在這幾章裏，我指出德蘇兩國好像遲早總會聯合起來，作重訂世界秩序的開路先鋒。現在這已經實現了，但這次合作是在猶豫不決的狀態中造成的，老實說，雙方都抱



着相當的戒心。但雖然如此，德蘇合作的重要性依舊非常大，在神經戰中，這確是一個驚人的戰術舉動。

我曾指出，在慕尼黑協定以後，納粹德國似乎不會在漸變的限度內活動，她決不會以作一個「有的國家」自滿而採取維持歐洲均勢的政策。納粹政權無所不包的「全民」動員，必然會很快地引它到一場全民戰爭，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戰爭在東歐爆發了；波蘭遭了難，這早就是很明白的一回事，波蘭如不在革命鬥爭中作德國的夥伴，就得被德國摧毀。

但後文却頗出人意外。波蘭被消滅以後，戰爭却並沒有採取普遍的軍事破壞的形式。在不和平的和平狀態和整壕戰這兩個形式之間，出現了一個新的形式。這個新戰爭形式的作用，不是僅在加強神經戰的程度嗎？這種戰爭行爲的發生難道僅僅是偶然的嗎？這種暗地裏的鬥爭——破壞國內的團結，摧毀抵抗的意志——不依舊是敵對行爲真正的本質嗎？戰爭已採取了一種消耗戰略的特殊形式，早期的軍事理論已不適用了，甚至封鎖戰現在也已沒有心理戰那麼重要。

或許有人會提出異議，說戰爭不過是只在準備階段，戰爭的到來是出於雙方意料之外的，任何一方都還沒有充分準備好。瓊格的預測當然含有相當的真理，在世界未來的大革命轉變中，現代的戰爭機械都要全部使用出來，要是沒有絕對的勝利把握而貿然使用它們，危險是太大了。這就是說，雙方都在等待人力物力財力的充分動員，使對方在自己壓倒的優勢之下投降，以求避免實際武裝衝突。但戰爭的結局是不能由軍事來決定的，因為雙方都不能達到絕對的優勢。綿長的防禦綫正在建築或修補。人力物力的動員正在不斷的擴大，雙方都在準備一次最後的衝突；在封鎖線的靜寂的表面底下，我們可以感覺到一場拚命的鬥爭正在進行着。「閃電戰」這個口號得到什麼結果呢？波蘭是它的第一個例子；但這也就是最後一個例子了嗎？荷蘭，比利時，瑞士遭受侵略的恐懼是錯誤的嗎？

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無疑的——在希特勒，這最後的武裝女仲裁是到來得太快了。他希望把他那征服世界的革命鬥爭分成幾個階段，把問題一個一個地來解決。在摧毀了波蘭和使西南歐的生存空間得到了保障以後，就得暫時停一停，進攻西歐將延遲到一九

四〇或甚至一九四一年。到了那個時候，他將又來一次像在波蘭一樣的錯式閃電攻擊。可是希特勒的算盤却大大地打錯了：他深信英法雖然在外交上極爲活躍，但決不會爲波蘭問題作強硬的干涉，更不會與德國開戰。德蘇協定的簽訂也是根據這個錯誤的計算出發的；它原來的目的只是想使西歐列強大吃一驚，使她們不敢真的發動戰爭。唯有這，才說明爲什麼希特勒不顧西線的軍事形勢而依然照着他的節目單進行對波戰爭。

德蘇協定以後，蘇聯突然進兵波蘭及波羅的海諸國，這無疑地是希特勒錯算西歐列強準備投降的直接結果。希特勒事先決想不到蘇聯會來這麼一手。爲了避免完全陷於包圍之中，他不得不放棄那些國家，因爲英法蘇包圍所產生的形勢，會比納粹政策最悲觀的批判者的預測更爲嚴重。德蘇同盟這個牛皮的代價，是德國喪失了她所有現存的同盟者。我在此書初版的第一章中，曾指出當戰爭一爆發，德國的形勢將極爲孤立，現在已由事實證明了。蘇聯是一個真正的同盟者嗎？在希特勒，反共陣線的轉變是一個極嚴重的失敗。德國的潛艇戰使她喪失了最後一滴的國外同情。各國仇恨德國的浪潮，決非上次世界大戰可比，她的隣國雖因恐懼而不得不保守中立，但這種順從的行動却掩飾不了

她們的仇恨心理。

希特勒的反應頗足表示他的特性。當他發覺他對西歐列強的估計完全錯誤的時候，他的第一個企圖顯然是想在西線發動攻勢。西歐列強拒絕接受波蘭的既成事實，她們拒絕聽取和平的建議；他在演講辭中大大地發洩了一番歇斯底里的仇恨。接着，他又以極敏捷的彈性完全改變了他的態度，又採取了他原來的計劃：他最有効的工具依舊是心理戰。

但形勢是否有任何真正的轉變呢？的確，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假定，要是他不進攻西歐，西歐列強也不會來進攻他。因此他可以在西線的保護之下繼續進行「全民動員」。並且可以比以前更順利地達到極限。西歐列強當然也在動員她們那無窮盡的力量，她們或許甚至可以超過德國；但她們不能得到絕對的優勢，她們不能抱着勝利的遠景而發動總攻擊。她們只會繼續不斷地擴張軍備，直到精疲力盡為止。這似乎就是希特勒的想法。

但精疲力盡的主點究竟是什麼呢？這是否僅是一個原料品供給的問題呢？德國在這

方面的劣勢，是否是這樣的確鑿呢？目前這種不流血的鬥爭的真正目標，是否想以此造成對方心理上的耗竭呢？

希特勒大概很可能會重新採取他原來的計劃，執拗地集中他的精力，使他達到權力的最高峯。有什麼事情可以證明他過去的算盤真是打錯了的呢？西歐列強不是只在作表面上的抵抗嗎？這難道必定是最後一次的動怒而不可能是一個暫時的雷霆嗎？時間在原料品問題上或許不會對德國有利，但在心理上難道不能對她有利嗎？德意志帝國的鐵的紀律不是比那些享慣社會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民主國家在心理上更能支持全民動員的重負嗎？她們不是遲早總要遭到嚴重的危機的嗎？謠言，煽動，恐嚇，勸告，這種種手段，在極平靜的「戰」時，對那些過慣太平日子的英法人民，不是很危險的嗎？

反過來講，德國人如從西線回到家裏，他們能希望得到些什麼呢？紀律，命令，拘束，不自由，還不是這同樣不愉快的命運嗎？不過是由排長換了一個地方黨部的行政官而已。德國人可以在回線等到頭髮發白。但那些比較自由的國家的人民却不能。自由和歡笑正在家裏等待着他們，以他們前線的生活和這對照一下，他們怎麼能老是等待而不

起叛亂呢？但這還不止只有心理上的利益。一種無需準備金的強迫通貨，行政人員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決不會感到缺乏。但自由通貨和自由經濟制度，雖然可以暫時受統制，却依舊可以發生很大的變動，產生很嚴重的危機。

這一切給心理戰披上了全副盔甲，它在現階段的世界革命中有相當的重要性。希特勒將繼續利用其它社團和黨派作義務煽動家。他暫時不會進攻馬其諾防線或借道荷比去奪取攻英的根據地，他要先解決兩件任務：一件是懨疲他的敵方。一件是保障他的原料根據地。他有兩種可能的前途——不顧一切，締結一個差強人意的和約或與蘇聯密切合作。

自由國家爲了採取全民動員的手段，不得不放棄她們以往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德國的全民動員迫使民主國家不得不同樣不斷地採用集體化的原則。這不正是世界革命的過程嗎？反對集體化的國家，現在也不得不採用它的法則了。仇視德國的國家，甚至也要歡迎集體化的機構，把獨立的工商業附屬在中央統制之下了。

無論形勢是怎樣的絕望，但希特勒却依舊繼續作戰，或許就是這些念頭在那兒作祟

吧。德國的領袖具有妖靈一般的魔力，確能向西歐，北歐或東歐作「閃電式」的襲擊；但他現在所以尚沒有那種企圖，所以沒有採用那種戰略，大概也可以用那些念頭來說明。

希特勒認爲一個差強人意的和平仍有可能，要是能得到和平，他就可以根據原來的計劃，把問題一個一個地解決，不必冒世界大戰的危險了。據他的想法，西歐列強並不想給德國人民找一個好政府。要是德國人民能容忍納粹政權，她們爲什麼要來干涉呢？這就是一個對一切痛詆納粹政權的批評的總答覆。他以爲在民主國家的眼中，德國政府所採用的手段都沒有什麼區別——都是一樣的壞。爲什麼德國不該有她所需要的政權呢？在任何自由國家看來，它或許似乎是可厭的，但它顯然很適合德國的民族性。

希特勒就這樣武斷地解釋了他敵人的思想。他還有一種很特別的意見供獻給她們：這個政權至少可以束縛日耳曼民族，和其它政權比較起來，它至少有壓迫和虐待自己人民的功勞。納粹政權的十年統治已把德國人民退化爲一個軟弱無力的奴隸民族。納粹政權存在得愈長久，日耳曼民族的創造力也被剝奪得愈澈底。所有這些念頭使希特勒想像中的敵人說：去懲惠納粹政權締結和約吧；因爲一個採取中庸之道的強盛的德國政府是

最危險的東西，它會喚醒德國人民驚人的更生能力而把日耳曼民族帶回到它以前的卓越地位。

希特勒充分地準備了這種論調，他要誘惑西歐列強甯願與他的政府締結和約而不願與其它的德國政府締結和約。他將努力向西歐列強指出，納粹政權在她們的眼中不論是怎樣的卑鄙無恥，但算起來還是很有利的。她們又何必提出毫無目的的苛刻要求，一定要德國採取另外一種政體而增加締結和約的困難呢？一九一八年提出的不正是這個條件嗎？而納粹政權又不是這個條件所造成的嗎？新的德意志共和國能保證和平嗎？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責的德意志帝國，難道還得為維持和平忍受更大的痛苦嗎？要在德國建立其它政權是一個鹵莽的舉動。從事情的本質上講，只有軍人才能推動德國的革命，但一個軍人政府當權以後，事情又將如何呢？西歐列強經過了一次世界大戰才把「普魯士黷武主義」推翻，現在難道又要使它復位嗎？難道又要建立一個新霍亨曹倫王朝，新「普魯士黷武主義」嗎？國社主義不是比那個政權更能提供好的保證嗎？在事實上，它不是西歐列強唯一的夥伴嗎？

希特勒以為這些辭句將使他得到他所需要的和平，並且在心理戰中，可以得到極大的收穫。他會狡猾地利用政治反應，他會利用複雜的形勢把人家弄得神妙莫測。在一個絕望的形勢裏，他像一個團結的標幟似地屹立着。這樣，他或許又可以得到一次心理勝利。

希特勒早就有遭受軍事失敗的可能。他會對他最密切的同僚說過，要達到納粹對外政策的目標，德國或許還得有第三次的掙扎。一九三六年重併萊茵區時，哥培爾代他召集了一次新聞界會議。到會的都是「絕對可靠的」新聞記者。哥培爾宣稱戰爭是遲早不可避免的。德國甚至必須估計到她自己的失敗。她能忍受最酷刻的和約條款；她會克服有一樣東西依舊存在——國社主義政權。那是更生的核心，有了它，更生的力量會以夢想不到的速度生長起來，然後在第二次戰爭中，或甚至用不着作戰，只要用她那勢不可當的壓力，國社主義統治下的德國就終於會征服全世界，成爲世界的支配者。

希特勒正在作心理戰。他主要的目標是獲得暫時的和平，一種休戰狀態。他能得到它嗎？要是不，那末戰爭一定得在最殘酷的大流血和大破壞中進行嗎？要造成世界和平



只有毀滅德國才能辦到嗎？這個問題的答覆和「德國對永久和平的貢獻」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下面這幾章的目的在說明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真正的動機，以論證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可以永久抑制像國社主義這樣的一個政治運動，沒有一個人能拉開它那有毒的爪牙——它的政治原則。不根本毀滅國社主義就不能有和平。僅僅使它失權是不夠的，但那可又是另外一個題目了。

希特勒的政治行為正像在一個無底的深淵旁邊作無休無止的跳舞。有人稱他爲「夢遊者」，這種說法頗爲正確，任何時候，只要他稍爲一失足，他就會立刻從領袖的地位上跌落下來。他這一次是否真會跌落下來呢？他是否能又從搖搖擺擺的狀態重新得到平衡呢？在今天，他的信徒和羣衆還是毫不疑問地相信他在最後必能得到勝利。這些人大多是青年，尤其是婦女。希特勒不乏羣衆和有力的防禦手段，但有一樣東西已開始起來反對他了——他的政治煽動和政治恐怖。他自己在心理戰時所用的武器正在掉過頭來攻擊他了。除了國外的心理戰以外，德國國內也正在發生一場祕密的心理內戰。受了幻想教育的青年們，爲了表示他們的信仰，自願去駕駛潛水艇，開飛機或充作偵探，但他們

的宣言並不能真正代表德國人民的思想。德國人民並沒有真正疲憊；他們并非真已不再能承擔任何嚴重的任務：他們暗地裏正在和他們的暴君作痛苦的鬥爭。

但爲什麼新秩序還沒有明顯的象徵產生呢？集中營和猶太人的屠殺不是已被全體人民消極地接受了嗎？波蘭和捷克斯拉夫可怕的大屠殺現在又不是被消極地接受了嗎？誰能爲我們表白過去這種種德國人民是無罪的呢？納粹政權和日耳曼民族還能有所區別嗎？尤其是，日耳曼民族能洗却繼續作戰的罪愆嗎？他們現在依然在支持希特勒，老實說，要是他下一個總攻擊令，叫他們使用所有的破壞武器，他們還是不得不幹，這種種未來的行動，他們能卸去責任嗎？

軍事領袖們對過去種種實該負很大的責任。他們是國社主義的催生婆，他們對納粹政權的建立，給予了一切可能的幫助。在納粹政權的劣性顯露以後，他們還不結束它的生命：他們既不預測納粹計劃所不可避免的結果，又不對那些計劃加以有力的約束。軍事領袖，各部長官，和工業及金融界的領袖過去顯然有立刻了結國社主義的工具。要是那個瘋狂的試驗現在產生了必然的結果——德國的毀滅——所有的罪咎應該完全落在他

們頭上。某些納粹領袖或許還可以少負一些責任，因為他們不明白自己在幹的怎麼一回事。但軍事領袖們却看得明白。凡是熟悉德國內幕的人都不能否認，只要兩三個師團就足夠推翻納粹政權和停止戰爭了，至少也可以阻止戰爭的開始。費里斯克將軍是德國最優良的士兵之一。他在一九三八年有權可以把德國和歐洲從悲劇中解放出來。但是他讓機會溜過去了。他的後繼者有領導德國向快樂之路前進的機會。但他們也讓它溜過去了。看來，這些能冷酷地計算的人，似乎只要還有一些小小的勝利機會，便以為還能一塊兒和希特勒工作，一塊兒玩他的把戲。

這樣看來，德國的滅亡似乎是無法可以避免的了。隨着她的毀滅，歐洲的統一也將成爲一個神話了。或許歐洲會成爲十年前霍斯浩佛將軍（德國國內政治黑暗的主要罪人）對歐洲的稱呼那樣——一個地理名辭。虛無主義政治正在歐洲不斷地前進。更生的力量却還沒有任何象徵。

一九四〇年三月於巴黎。

本書原名 *Hitler's Aim in War and Peace*。著者魯許尼格博士 (Dr. Hermann Rausch Nigg)，爲國社黨要人之一，曾任但澤主席，後退出納粹政權。其所著之「德國的虛無主義革命」一書，爲研究國社主義之鎖匙。本書卽爲該書中最重要之數章，對英德關係及德國對外政策的趨勢及手段分析極爲詳細，並經著者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另寫序言一篇，暢論二次大戰爆發後的局勢，尤爲可貴。

目錄

原序

第一章 一個公道的和平政策

暫時的創傷——結束革命還是永遠繼續革命

第二章 革命在對外政策上的目標

政治概念及政治趨勢——生存空間及人口壓力的神祕原則——沒落的
權威和垂死的民族——諸小國重要性之遞變——被保護國及主權——
陰影籠罩着舊殖民強國——革新的強國——抗拒的強國——統治制度
的新原則——世界權威德意志的統治——民族與帝國——民族自決
的能力——歐洲發育的細胞——防禦同盟——反歐洲——世界的新輪

廓

第三章 向革命邁進……………六七

實際問題——波蘭——普遍的不安——蘇聯——原料路線和權威的據

點——短距離目標和長距離目標——國社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色彩

第四章 向最高權力及最高支配權邁進……………一一九

技術及戰術——希特勒的勝利——危機——一個歐洲式的解決

第一章 一個公道的和平政策

暫時的創傷

某些聰明的國社主義信徒，早就在談論國社主義政策傾向和平的一個大轉變了。在奧大利被佔以前，他們總是說，希特勒在對外政策方面，已夠得上說偉大這兩個字。他早已拋棄了一切革命時期鹵莽的渣滓，他正在悄悄地準備一個偉大的和平政策，一個使歐洲和睦融洽的建設計劃。只要等德國重整軍備一完成，那時憑着她那不容爭論的力量和不能攻取的地位，德國將創造歐洲新秩序和一個永久的和平。這自然先得承認德國的

某些權利和廢除某些苛虐的條件。國社主義已放棄東進和西進的一切冒險計劃，在兩三年的時間內，德國一定會跟西歐列強和洽起來，一套新的條約會給歐洲帶來和平、安全、繁榮及發展。

那時，德國會準備恢復世界經濟制度的會員資格，重入國際信用市場；她會貶低馬克的價值，實現德國與西歐列強間那遲早總要到來的通貨調整。那時，她已恢復了強國的地位，她會成爲歐洲永久和平的中心。

那時，所有在這幾年鬥爭時期就攔下來的內部事務，也會舉辦起來，最重要的，就是重制憲法。束縛人民自由的苛刻限制自然可能鬆弛下來，所有暫時不合法的舉動也會消失。國社主義會調過頭來從事於最接近它中心的任務，去增進人民的福利和終止社會鬥爭。最後它可以致力於那會一時遲滯下來的建設事業，回到田間，創造一個新的農村社會，以及一切它認爲形成它的特殊使命的任務。

所以，他們申辯說，國社主義絲毫沒有想使全世界永久受革命威脅的企圖，它以身作則地去證實它的信念，鼓勵其他各國來競爭，這實在是一件大可欽佩的事。領土的征

服尤其不是它的志願，只有在純然例外的場合——舉個例說，如蘇聯或法國有了劇烈的進展——德國才不得不起而干涉，以保障她那生死相關的權利。而這樣的場合可以用冷靜的態度去等待；因為國社主義現在已這樣的堅強，任何事物都不能把它推倒了。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以前，這種觀察正符合了德國民族主義者和保守黨黨員所深信不疑的希望，德國的外國朋友一直也這樣的相信。這種意見顯然會鼓勵西歐列強盡了相當力量去協助德國，使她和平地達到她的政策，以縮短德國的革命階段。她們用合法的程序來廢除凡爾賽秩序的最後遺跡，使轉變的進行比較和平，免得德國使用片面廢除的手段，這就是英法在德捷爲蘇台德區起衝突時的態度。這種態度頗爲公正，它有一定的限度和明顯的目的，德國所提出的要求只能涉及凡爾賽和約範圍之內，這麼一來，國社主義政權對和平的希望就可半途而得，不然也可以證明它的缺乏信譽。

這無疑地是一個胸懷寬大、態度公正、勇敢而忍耐的政策。不錯，在慎重考慮這個政策的時候，英國方面的輿論曾對國社主義截至目前爲止所許諾的未來和平政策表示十分懷疑。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當張伯倫說：有一個國家「決心想用武力的恐嚇來

主宰全世界」的時候，他分明指的是德國。當他形容德國的態度是「不理智」的時候，顯然他對德國過去的政策並沒有存什麼錯覺，英國已揭露了希特勒對蘇台德事件的企圖，但是她依舊誠切地表示準備去鼓勵它，使它的性格改變。（譯者按：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張伯倫並沒有那麼好心眼兒，也沒有那麼傻，他明知希特勒的野心是無限的，他也明知他的鼓勵不會使國社主義的政策改變。他的一肚子陰謀鬼胎，不過是想喂滿了德國，使作爲反蘇的急先鋒而已。）

的確，我們很容易相信，在俾士麥所謂「暫時的創傷」治好以後，在德國不再衰弱和處在被包圍狀態以後，偉大的德國政策會宣佈一個懇切的決心，去和其他各國共同進行和平的復興工作。我想起了俾士麥對德國政策的限度所下的定義：「當我們恢復了我們所能得到的疆域以內的統一之後，我理想的目標，一向是在使歐洲大小國家信任德國政策的企圖，一旦暫時的創傷治好，一旦國內復歸統一，德國政策就要去追求和平與公道了。」

但什麼是新的「暫時的創傷」呢？在尋求和平的新工作中，怎樣才算公道呢？是聯

合德國領土附近的日耳曼民族組成一個大德意志嗎？第三帝國會限制她自己和平地使用她新獲得的力量嗎？她是否有在過去歷次廢除凡爾賽條約中的壓迫因素過程中得出對外政策的結論呢？關於這幾個問題，值得我們再來引用一段俾士麥的話。他說：「我們應該去努力減少煩惱，我們應該和平地使用我們的權勢，以造成一個真正的強國，這樣就可以使全世界信服德國主宰歐洲，是比英法俄的主宰更有用，更公平，並且也更少損害其他各國的自由。」這幾句話，也可以用來指示我們這一代的德國人怎樣去推進歐洲和平政策。德國政策之爲善爲惡，在於她怎樣去使用她那恢復的權勢以達到她的目的。要是她用公平的精神，俾士麥所教誨的「高尚而和平」的領導態度來使用它，那末，德國的政策將真是建設性的，即使它在最初遇到反對和懷疑，最後也必能得到擁護。舊秩序的不會激動任何國家；惟一激動人心的問題，是什麼東西來代替舊秩序。

但說到這一點，第三帝國政治生活的全部構成要素却顯出了重要的病態。難道新秩序的要素只是這種——威風凜凜的徽章、訓練、束縛、獨裁式的劃一嗎？難道只是聯隊化、集中化、官僚化嗎？難道只是對肉體和精神所施的恐怖手段和壓迫方法嗎？一個國

家的政治狀態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對內政策是和對外政策的目標有密切的聯系的。

過去的種種行爲，或許可以用「暫時的創傷」，用帝國的困難情形來證明其正當，納粹領袖那種出人意外的片面行動，也可以用這是勝利的必要條件來解釋。那些事情不一定就證明德國永遠是虛無主義的信徒，永遠是個搗蛋份子，永遠具有填不飽的帝國主義野心。要證明國社主義的永久革命性，必須提出特殊的標準來。這種標準可存在嗎？

結束革命還是永遠繼續革命？

我們得把兩件事分別開來，希特勒要求和平的志願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但那並不就是說他在對外政策方面已沒有從事大革命的企圖，已不再想建立一個世界帝國。這兩件事是並不矛盾的，不論德國的流行理論怎麼樣，我們可以斷定希特勒決不願引起戰爭，破壞國家正常的生活狀態，他的方法是矢不血刃的戰爭，就是他所說的「擴大戰

略。」在這一點上，他確是遵守了克勞斯威士（Clausewitz）的原則的，就是：只要有
一支堅強的軍隊存在，就足以向較弱的對手實現對外政策的目標。

但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的真正目標究竟是什麼呢？

德國的目標不是復仇，不是恢復一九一四年的疆界，而是「全盤修正，」造成「完全不同的局面」（G威爾森語），「全世界的返老還童」（布克哈特語），「當各國都穿着七里格*長的靴子，大踏步地匆忙前進的時候，日耳曼民族不能讓它自己被禁錮在一塊小地方裏。」（霍斯浩佛語）

從一九三八年秋季的事情看來，德國對外政策的特質，不是結束革命而是永遠繼續革命。這單純的事實，並不因任何協定，任何宣言，任何希特勒的演講而有所改變。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希特勒就在帝國會議要結束德國的革命的了，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不值一文的謊話而已。（希特勒永遠把政治宣言當作政治武器；它們決不是事實真相的報告，甚至不能代表他的意見，我不禁要摘引幾段話來和後來的事情對照一下。

一里格等於三英里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所謂德國企圖破壞奧國邊境之談，全屬無稽之談，毫無根據。」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德國並無干涉奧國內政之企圖及願望，更無意於合併奧國。」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在歐洲決不再有任何領土要求。」誰都記得，當佔領奧大利的時候，希特勒對捷克疆界的尊重，曾給以何等莊嚴的保證；但僅僅在六個月以後，他就去攻擊捷克的存在了。所以實事求是的政治家應多多捫心自問，希特勒宣言和平的目的是什麼？不應該依它的票面價值貿然加以接受。）

但是，在實際政策上，真能有像願於發動永久革命這麼一回事嗎？它能產生什麼好處呢？那種問題，當然是普通公民因不理解國社主義的手段而提出來的。提問題的人往往會守株待兔，等候它內在的轉變，等候它的成熟。但要是國社主義者曾經說過一句符合事實的話，那末，那句話就是哥培爾的「世界重分配的寶貴的時機已經到來」了。

希特勒的現實主義瞞住了旁觀者。這個傢伙，他能這樣冰冷透澈地設謀劃策，他能等待適當的時機，他可以說是帶着操必勝之券的態度摸路前進的，他不斷地在試探各國的弱點——一個這樣現實地考驗一切的傢伙，在同時，却又是一個要推翻一切，進行一

個無盡頭的革命運動，以創造新秩序自命的異想天開的傻瓜，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這種二重性，事實上正是布克哈特（Jacob Buchhard）筆下那些大「破壞家」的主要特性。這一類型的入具有「破壞的天才」，他們有一種尋求弱點的特殊本能，他們能在那些弱點上實施壓力，以此摧毀舊秩序。他們命定了要不斷地這樣幹下去，直到一個真正的創造意志阻住了他們，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方才罷休。這些人具有豐富的戰術天賦，他們同時又是魔鬼的使者，具有千里眼，是被幻想創造出來的夢想家，他們自以為是近乎上帝的一類人物，他們雖然在做事時抱着全套現實主義，可是却生活在一個不現實的世界裏。

國社主義政策只有衝動，沒有固定的政治目標，只是衝動和一套戰術而已。國社主義的政治目標是沒有飽和點的：它不能有。所以，去問它那「動力」外交政策的最後要求是什麼，是最愚蠢的事了。

把德國的新對外政策認作大德意志政策的最後形式是不正確的。第三帝國的對外政策超出了任何國家在過去所訂立的最極端的界限。根據假定，它是一個「公道的和平政

策」。但是——「新的和平將使德國成爲地球的主人」，「和平不是懸掛在眼淚汪汪的和平女神的棕櫚葉上，而是建立在那爲創立高等文明而接管世界的領袖民族的勝利之劍上的」。這就是羅森培口中的國社主義的主要政治原則。希特勒的用辭雖較爲通俗，但它所表達的野心勃勃的遠景，却並不比之較弱。



第二章 革命在對外政策上的目標

政治概念及政治趨勢

要窺測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的中心思想，我們除注意這一運動的流行讀物如我的奮鬥等書外，必須還得注意一些其它的資料。第三帝國國內在對外政策方面的意見，我們無須乎加以考慮。他們之間細微的差異，現在已不如過去那麼重要；其實他們只有在步驟和零碎方法上稍有差異而已。不論在何種場合之下，我們是不必徒費心力去探問這些差異的，因為歸根結蒂，它的決定者總是希特勒；在這方面，他的確起着領導作用。他無

疑的是這方面的大師，並且，也是惟一調整對外政策的音調高低，步驟快慢的人。

老黨員和地方領袖在對外政策上，佔比較不重要的地位，雖然有時我們也很奇怪的聽到東歐問題專家羅斯特先生被稱爲希特勒的「智囊」，羅森塔被稱爲國社黨最高「專家」，但他們在對外政策的決定所起的作用，却沒有在「鬥爭時期」那麼重要。他們的意見早就不能得勝了。奚斯週圍的人物如里賓特羅夫和波爾，雖然犯過幾次大錯，但仍佔着比較重要的成分。官方的專家，如像紐拉特這一流人，只是用來當作編製上的顧問，對納粹政權聰明過分的政策加以修正與調和，對草案加以粉飾及修辭而已。有一個人名字該得特別提一提，那就是退職少將，現任德意志學院院長霍斯浩佛教授。他和他的「地理政治」學院，對納粹政權對外政策的企圖的明朗化，有很大的貢獻。關於他的文章，我們應該特別注意，有許多納粹政權的靈感和企圖，他曾給過非常誠篤的表白。

首先，我們得防範兩個錯誤的觀念。加緊拓殖德國在東歐所獲得的領土，已不再是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的中心目標了。這個觀念雖依舊在某些人的頭腦裏盤旋着，但它已毫

無重要性。以農業殖民形式向東擴展的不可能，正像「血和土」的奇談一樣明白；且不能說可能去殖民的人數不夠，單是那種方法的本身，也是和納粹帝國主義的實際政策矛盾的。一切帝國主義都要使自己的民族脫離它的土地。「動力政策」的實際口號，不是回到田間，而是擴張帝國，在歐洲建立一個大德意志。第二，有些人以為德國將在最後的鬥爭裏結束法國的軍事強國生命，隨着法國人口的漸減，德國可以把她「世仇」的政治地位降為二等，但這也已經不是納粹政權的主要政治任務了。這些在我的奮鬥及國社黨其它陳舊的流行讀物裏提及的目標，已大大地被事件的進程所排斥了，至少也已不復能吸引人的注意。他們沒有觸到國社主義政策的本質。國社主義政策的本質，可以用兩行流行的希特勒青年團進行曲來概括它：

「我們今天是德國的棟樑

明天是世界的主人——」

國社主義政策還有一個轉變，就是政治手段的第一步不常是武裝行動了。自從希特勒的標準工作——革命，戰爭，公開的暴行——呱呱墮地以來，我們到處都可以覺察到

他的政治天才已漸在成熟，狡猾的壓迫手段已漸漸代替了上述種種手段。這個發展在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上，似乎依舊在進行。妙用無窮的新政策的戰術，是從不斷擴大的政治計劃兵工廠裏裝配出來的。這兒，我們又可以看到，揭露國社主義政策的本質的，不是什麼原理原則，或顯明的目標，不是什麼保證，盟約，軸心，決議案或莊嚴的協定，而是它的戰術。

生存空間及人口壓力的神秘原則

根據「有機生物」的宇宙論或國社主義教育家的哲學，對外政策的原動力就是人口壓力。德國應該革命地運用那愈來愈大的人口壓力，以造成擴大領土的急需。這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殘忍的生存鬥爭——強者排斥弱者或征服弱者的鬥爭。這些理論家說，敵對的國民意志和國民力決定了兩國間疆域和領土的分配，此外的一切都是空想。因此，把國社主義虛偽的原則除開，回到它的基本法則上來說，它是一支解放的兵力。一切國

家不論什麼事都得憑活力來決定。拉薩爾 (Rosa) 在很久以前就說：「豐富的土地可供維持生命之用。」霍斯浩佛把這句話注譯為「古典派之國家生命生物律。」他說：「人類有『尋求土地以維持生命的天賦權利』，他們可以堂而皇之的憑着這種權利去攻擊『那些擁有大量空地而沒有能力去開發的人。』」

我們知道，一個活力強盛的國家要有擴張的機會，惟一的方法，只有從物主的手中去接收大量空地。這種沒收就是我們這一代最堅強的特性，並且可以用適當的方法加速它的進程。它指明「各國間的生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霍斯浩佛說：「世界又慢慢地開始認識生存鬥爭的不可避免性了……在機械主義的世界中，自存的主要要素只有兩個，就是一國土壤的糧食純供給量和必需原料品的數量。」從這幾句話裏，我們已可看出現代政治的一般了。

在對外政策上，和「生物」的宇宙論有同等重要性的就是人口壓力。霍斯浩佛寫過一篇「東歐窒息的危機。」他說：「過分的人口壓力已成爲現存世界秩序內的一點爆炸劑，怎樣去處置那些要生存到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的德國人，波蘭人，捷克人，是和我

們關係最密切的問題……然而所有那些整天在議會中忙碌於細微末節的人們，他們的思想却顯然與這個問題離得太遠了。」用國內移民來解除人口壓力，不過是一種應急辦法。國內土地權的分散，並不能解除人口壓力。它只會迅速地造成那在生存線上掙扎的中國小自耕農的觀念，他們除了自己耕種的土地以外，對生活毫無其他興趣。國社主義老實不客氣是主張放棄國內移民政策的。但歐洲所有的空地都已過於飽滿了，所以即使在歐洲征服領土，也不能消除人口的壓力，「動力」政策決不能以修改疆界和局部解決為滿足，它必須尋覓一個總解決，一個「世界重分配」。我們要懂得，只有依照各國的活力給以適當的領土，才能把問題真正公平地解決。德國必須從垂死的民族那裏把領土拿過來。只有爲了這種目標去犧牲兩百萬青年的生命，那才是合乎正義的——領袖（譯者按：指希特勒）在他的同僚討論東方領土政策的時候，曾這樣宣稱：

因空地不足而引起的窒息危機，却又配合着一個同等嚴重的因人口不足而引起的國力瀕竭危機。一個國家必須保持她的人力；必須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增加她的人口，這並不是似是而非的議論，而是一種因果關係。在人口過剩和領土不足的後面，却緊緊地

隨着種族滅亡的幽靈。在我們現代歐洲文明上面，却翱翔着古代世界傾覆和人口滅亡的夢魘。E本幾世紀前曾用嚴格的社會法規限制她的人口，但在她的帝國主義時代，人口空前地增加，這個政策現在日本已不再能採用了。歐洲「嚴格說來，在未來的二十五年內」，霍斯浩佛說，「人口的增加和生存空間的供給……對於一個種族和其它人種競爭的前途，有決定的重要性。一九一四以來，事件的演變，應該使每一個德國人都十分明白，爲什麼德國必須進行種族政策」。領土的缺乏不能用限制生育來醫治，不論那一個民族，它要是想繼續生存，它就必須用一切方法去促進它人口的增加。霍斯浩佛說：一個國家的再生和返老還童，事實上的確是可能的，對外政策，不但產生了一「以種族自保求得種族永存」這原則的需要，並且也產生了它的可能性。這個原則所指示的任務，就是種族精選種族衛生，並且因爲領土政策是由種族精選種族衛生所造成的，或以種族精選和種族衛生爲條件的。因此，不但要使現存國界的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有一個健全的平衡，而最重要的還是在擴張領土。這個原則所指示的任務，總括起來說，就是建立一個「種國」。(Racial State)

以限制人口來使人口漸漸減少，當然會解決領土問題及許多與它相關的政治問題，但一個民族要是這樣做，就等於自取滅亡。據這些理論家說，英國在一世紀之內，將降到一個小國的地位。他們又宣稱說：一個充滿活力，對前途抱有信心的民族，可以在人口不斷的增加中，看到它前途的保障和優勝的確證。這種預言的確是很動人聽聞的。像在重商主義時代一樣，人口現在又被看作財富的一個重大因素了，但一個現代的民族，它不但需要人口，而且需要純種同種的人口。一個想發展的民族，不但需要有生存的意志，並且需要有成爲權威的意志。不發展人口壓力，它只有自取滅亡。沒有這個壓力，就無法推進它的動力政策。這個政策的觀念雖然兜了一個大圈子，但却仍回到了老地方。動力政策是人口壓力造成的，但要是繼續不斷的推行動力政策，却又需要用人口政策來增加這種壓力了。

哥培爾先生知道世界重分配那寶貴的時間是會來的，他以爲所有的民族都可以享到這個革命的利益。這種宣稱就是動力對外政策行動的前奏曲。

追問沒落的權威和垂死的民族這兩個觀念並不是無謂的。它們並不僅僅是一連串字眼兒或幻想。它們是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的基礎。我們只要一想到西歐生命力的逐漸消滅，必然會產生十分確定的結論：西歐有過多的空地，而佔據着這些空地的，却是些精疲力盡的民族，或至多只是些生育率快要變成零的民族；它們遲早總要向強者屈服，把多餘的領土讓給它們的。西歐有命定了要被沒收的地方——這更不像東歐那麼有很高的生育率。這兒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將趨向消極，僅致力於保持產業，保持生存，只是一種沒有抵抗力為後盾的政策而已。努力爭先的民族領袖們可以放心依賴在這些弱點上，以無限勇氣運用戰術，而不致有任何危險。擁有中等人口，立刻向國社主義投降的德國就是這麼一個民族。它所要打倒的，只不過是些紙老虎。它之所以能成功，就因為西歐列強已喪失了實際權勢。只有循着這些途徑，才能期望國社主義者為什麼能確切地斷定

不列顛的地位一定要衰弱，和法蘭西的強國地位一定要消失。

舉一個例來說，法國自三百年前最興盛的時代以至今日，人口有了怎樣的變遷呢？那時法國的人口，有歐洲萊茵河以東，俄羅斯邊境以西的全部居民那麼多。那時的空地是在東歐。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形勢依舊是對法國有利的，但今天，她的人口却只有德國的一半了。

不可否認的，國社主義已用這種論據觸到西歐各民族的特點了。前法國總理佛蘭亭氏最近也用過同樣的論據，從人口的觀點看來，西歐各大民族是沒有前途的。那些人口依舊在增加的民族已有了勝利的把握，它們可畏的野心已有了前途。一九三八年夏末希特勒大胆的政策所以能夠成功，主要的，並不是由於神奇的戰術或廣大的智囊，而是那從生物現象的認識上得出來的信心。

國社主義者散佈輿論，從來沒有像宣傳不列顛帝國滅亡的信仰那麼賣力過，他們認為她的傾覆已經是一種既成事實了。「當作一個帝國的軀殼來看，大不列顛已經是死得像羅馬一樣的硬了。」這是美國新聞記者庇德在世界大戰以後不久所說的話。但德國人

却更進一步。他們不像庇佛那樣問團結不列顛的精神鎖鏈是什麼，却老實認爲霍斯浩佛所說的「不列顛島國已變成威尼斯」這句話已是事實。霍斯浩佛在論到這一點的時候會說，這是在「一條崩潰的弧線上不可避免的最后一幕。」那「年邁的帝國」已「疲倦」了。「她還有能力下這樣大的決心嗎？……她大概已精疲力盡而只想享權利了吧！」在霍斯浩佛看來，在不適當的時機傾向和平主義，正是「英國的帝國意志衰弱的特殊象徵。」

像其他許多國社主義的聰明人一樣，霍斯浩佛在論及該死的不列顛帝國的時候，總能夠把題目翻些新花樣出來，從不會感到厭煩。英國「統治的特殊本能」已退化成一個又老又鈍的器官了。一九二六年英國規定帝國與屬地間以平等爲基礎的時候，他解釋這種行爲是——「統治最明顯的投降」。「當全世界都顯然在對領土和人口實施極權的時候，「不列顛帝國的體制却遭受了「一個劇烈的變化，它已愈來愈鬆弛，發展成一個聯合王國的形式。」霍斯浩佛在他的「地理政治學」原理中，不斷地提到這件事實的基本重要性，說英國已消極地放棄世界權威的地位了。

從大體上說來，德國輿論中的反英情緒已被純粹政權消除了。慕尼黑協定以後，它已斷然一變而為親英。黨的領袖們以為英國在下次世界大戰中已敗北，她決不敢再冒險進行一次新的世界大戰。她已不再能用武力保護她的支配權。年青的民族支配世界的時候已到了。「白種人的負擔」在英國疲乏的肩頭上顯然已太沉重，新德意志必須準備把它拿到自己的肩頭上來。但這樁合夥買賣，並不僅僅是說日耳曼民族將代替英國人去斬殺；在這樁合夥買賣中，年青的合夥員必須把買賣上的實權都抓過來才行。

「英國需要和平，只有維持和平，她才能在世界上暫時繼續維持她那岌岌可危的地位。」西克特將軍在幾年以前就這樣發表過他的意見。英國已不再能冒險去挑起一次戰爭，所以德國可以對她加施任何侮辱而不會有受災的危險，這種論調，早就成了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的第一條格言。賀爾威格 (Von Bethman Hollweg) 常常說：張伯倫首相的最高任務，就只是「綏靖」而已。黨的領袖們認為這就是英國現在所能做的最高限度。而「綏靖」政策也一樣會毫無結果，這種假定似乎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每一個政策，在開始的相當時間內，總是依着它的第一個步驟走的。英國的第一個

步驟是自動裁軍，這個步驟保持了好幾年。它應該解釋爲意志衰弱的表現，此後的發展，自然也一步步地跟着來了。在新的強國正在興起的時候自動放棄強國的工具，這不僅是一種失策；而是自動讓位的類似表示。霍斯浩佛說：「世界上最有力的兩大領土觀念正在攻擊英國的存在」，而英國却減裁了她的軍備。面對着這種發展，「不列顛世界帝國惟一的久遠之計，只有維持她在文化生活及經濟生活上的地位」。據霍斯浩佛說：這就等於是生存意志和強國意志的滅絕。

雖然英德兩國在某些意味上說來還是同一的血族，而德國有和英國聯盟的願望，但國社主義者却對英國存着一種非常明顯的惡感，這就是兩者間關係的重要特點之一。但雖然如此，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却一再表示：德國要和英國維持友好關係的政治信心。在這一點上，政治反應是和根深蒂固的情感作用相矛盾的，這不但在黨的領袖中間是如此，連黨外的許多人都都如此。德國人對英國的惡感，是直接從反猶太主義的觀念裏演變出來的。那浸透了舊的精神的英國清淨教，已成了資本主義的主要代表物。在國社主義者看來，這就是猶太人的主要成就；因此，他們認爲不列顛帝國是一個猶太帝

國，支配這個帝國的，是猶太式的經濟管理，猶太式的營利精神。英國人頭腦裏的自由主義，是空德聯盟最重要和幾乎不能超越的障礙。在過去，英國是被蔑視爲（也被做）一個商店老板的國家；她的僞善和「背信」大受各國的斥責，但德國目前的納粹政權却更進一步。浸透在清淨教中的英國人已成爲近乎上帝對伊色里所許諾的那樣一個民族，他們已澈頭澈尾地猶太化了。英國被斥責爲猶太精神統治歐洲的象徵。英國把經濟上的成就和上帝的祝福混而爲一，以此作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的骨幹。英國是猶太。這些語句，當有一天第三帝國感到必需準備一場鬥爭的時候，就會在國民宣傳中用來詆毀英國的。截至目前爲止，納粹政權還在那兒諂媚求恩，但在國社主義者私人的討論英國最後一次背信的時候，已在引用上述的幾行文字了。他們確信，要是英德爭執在刀兵相見的時候，英國一定不能再保住她的地位，和一九一四年相較，德國的地位已有了起決定作用的大進步。英國現在只是一隻紙老虎而已。她那虛構的威勢，要是可能的話，將在和平的變遷中告一結束。但要是必須訴諸武力的話，德國也無需乎畏懼。就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天，我們就會明顯地看到大不列顛已經喪失她的世界統治權了。

不論從體質或政治上來說，法蘭西總是一個「垂死的民族」。她的人民很妖嬈，很討人喜歡，或許甚至是很快樂的，他們什麼政治工作都不幹。但一個胸無大志的民族，也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這些估價並不含有什麼憎恨在內。德國人戰前對法的敵意，現在已有了劇烈的變化。法國過去的德國朋友，或甚至現在的德國朋友，也都抱着這般一般的見解。一位東歐政治家曾用婉轉的口吻對我說到那籠罩着巴黎的死的氣息——「並沒有真正聞到，而是預覺的」。國社主義的主要人物說，法國已不再是一個精神奮發的民族。它已變成了一羣謹慎、執拗、經濟的人口，說得最好也不過是一批沒有上進心，沒有黃金時代法國人的野心和莊嚴氣概的，枯燥無味的蠢才而已。它已不再是那造成法蘭西歷史的民族，已不再是那雖小而具有一大筆精神遺產和政治遺產的民族——它只僅僅是歐洲地面上的一個二等民族而已。在未來的勳力發展中，它遲早總得從歐洲中心被排除出去而被迫採取防禦行動的。但一個動人的民族至少是值得憐憫的，這樣的一個民族可以任其自生自滅，因為時間已在鐵面無私地摧毀它了。有一天，當法國也被證明是一隻沒有能力援助她的友邦和同盟國的紙老虎的時候，德法問題也會自然而然地解決

了。

我的奮鬥表示，在國社主義者看來，德國要在「東歐自由行動」，必須以摧毀「西歐的法國軍力」為條件。當希特勒寫我的奮鬥的時候，法國的勢力還相當被重視。那時，要「保證我國（譯者按：指德國）後方……為我國人民增加歐洲的生存空間」，「德法間的武裝衝突似乎是不不可避免的，但目前，在國社主義對外政策實行了幾年以後，爭奪歐洲的主宰，似乎不必一定要和法國作一次最後的戰爭了。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會說，幾年之中，德國的形勢將大為改觀，甚至在西歐，她也可以用兵不血刃的手段去採摘她重整軍備的果實。十年以前，他曾說德國人不能接受西歐的現存秩序，必需用一次最後的，決定的鬥爭無情地摧毀法國。現在，德國已有簇新的機會可以去誘導法國，誘導那垂死的民族自動放棄她過去在歐洲的統治權了。這個謹慎而敏感的民族，已不再能作光榮的，英雄主義的夢想，一個小布爾喬亞的民族，關於了解對德新戰爭的無用這回事，是看得太清楚了。

大家都知道，這種思想早就支配了黨的重要份子，它對反奧反捷政策起了很大的作

用。德國人對法蘭西民族並沒有仇恨，相反的，甚至那些對他們的敵方時常作不公平判斷的人，對法蘭西民族也抱著像對士兵一樣的無限敬意；但這種敬意，還配合著一個同樣大的蔑視。他們蔑視法蘭西民族的政治目標。法蘭西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是全世界人士一致公認的，但它已隨着世界大戰同時結束了。這個民族除在國防線上作一次英雄的抵抗以外，已不再能有別的成就；它決不會準備再取攻勢，它的精神是永遠破碎的了，誰都不相信法國遠征軍會在德國對外戰事中有何重要性。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告訴我，人家懷疑德國企圖孤立法國或包圍法國，其實這已經是不需要的了；法國正在自動孤立她自己。她除此以外，別無他法。這種估計是在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前就有了的。據我的情報員說，在摧毀法國這一點上，德國人民是和希特勒不一致的。對法戰爭與德國的民意極不相合，德國人並沒有世仇的觀念或希望報復的情緒，他們只想用不流血的手段削弱法國，設計把她趕出她現在的地位而已。德國或許會宣稱法國政府為德國人民的仇敵，但對法國人民仍將表示同情。法國內部或許會因此而內訌。那時，德國就可以像昔日拿破崙開入德國一樣，跑來充當法蘭西民族的「解放者」了。法國軍力的命運，或

辭會像捷克那樣——馬其諾防線還沒有機會顯示它的威風，法國就已經投降了。

諸小國重要性的遞變

布魯(Bulow)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寫過一段國務卿嘉古(Jacow)和法國駐德大使凱姆朋(Jules Cambon)二人在柏林的談話，那時正是上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個月，在那段談話中，嘉古發表他對歐洲諸小國前途的意見，其中尤其著重比利時。他並沒有說比利時的巨大殖民地對這樣小的一個國家是太重的負擔，但是他認為將來在重建歐洲秩序的時候，諸小國決不能再會像過去一樣的獨立存在。凡爾賽和約正巧實現了和這相反的原則，實現了民族自決權。霍斯浩佛說：「這種有利於諸小國的開倒車，」只是表面的。拉薩爾的國家領土增長定律和國家領土不斷擴張定律依舊正確。在霍斯浩佛看來，「小面積構造」是「崩解和蒸發的形式。」它們「合併成大面積」的趨勢，是「世界政治加速度前進的一個最真實的朕兆。」「至於這種獨立面積大小的評價是否正確，」我們

只要看，在短時間內，世界政治圈裏已出現了一支莫大的毀滅勢力，這就是「小面積構成」合併成「大面積傾向」的明證。把那些「當作中間折衝地帶的小國家看作世界政治圈內真正的獨立存在物」是一個愚笨的幻想。霍斯浩佛說：「世界政治面積不適當的擴張，」是一種災禍。據他看來，這種不適當的陰影已籠罩在比利時殖民地 and 荷蘭殖民地的本土上了，已籠罩著丹麥，波羅的海諸國，瑞士，希臘了——所有這些國家，從她們面積的擴張上看，已不再是世界政治真正的獨立存在物。諸小國已面對着一個殘酷的選擇，她們不是把自己隸屬在那些足能自保的西歐列強的保護之下，便是成爲新的動力國家的一個聯邦。她們不得不在這兩者之間取一決定。從此以後，她們的獨立存在地位實際上已被否認了。至於西歐列強的保護和集體保證制度究能給她們以若干幫助，現在已愈來愈成疑問，因爲甚至在那些強國本身的安全是否可靠，也還在未可知之中。

將來各帝國主義互相爭雄時，諸小國能自己有點作爲嗎？諸小國重要性的遞變，在政治上，是一件有革命意義的事實，這種革命意義已由國社主義的宣傳家有力地傳揚出來了。捷克事件的處置告訴我們諸小國在政治上其實已失去其獨立地位：慕尼黑協定已

明明白白地把它證實了。那個革命的先例已把歐洲大廈全部化為廢墟。捷克的命運明天也可以降到任何其它國家的頭上——不論她有多久的歷史。我們必須把目前正在形成的大面積認為是未來歐洲大廈的一個構成因素，而且是惟一的構成因素。我們既已承認主權可以有程度的差別，那末，諸小國此後惟一的出路，就是去尋求一個保護者的友誼了。

據地理政治學者說，那些抱著狹隘的個人主義的孤立小國，在目前只有一種求助的方法，就是去尋求一個友誼的保護者，屈服於她，在大國的領導之下合併成一塊大面積，藉此換得一種假獨立。二十年來，我們過於看重了歐洲各小國的獨立地位，而結果却使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聯盟只能用優勢的兵力才能造成。要得到他人的同意，除了誠意以外，還可以有別的手段。關於這一點，誰都沒有像俾士麥那麼懂得清楚，剛

毅的動力國家目前正在步步高昇，她循着俾士麥的足跡，但却須與俾士麥創造第二帝國大不相同的手段，在強迫諸小國多少自動地成爲她的被保護國和屬地。我們不妨公開地問一問，那一種聯盟比較耐久呢？德奧合併是愛還是強迫造成的呢？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一個沒有極大優勢兵力的國家，是不能吸引勢力較弱的國家的；因爲弱小國家有兩種需要，她們固需要尊重她們的獨立，但是重要的，還是在找一個依靠。因此，她們必需從較強的國家那兒去尋求她們所缺乏的力量。加爾諾基伯爵(Count Kolnoky)說，南斯拉夫民族的友誼是不穩當的，由恐懼或物質利益造成的結合，比愛的結合更有効，因爲那些動機比愛更可靠，愛畢竟總是有盡時的。這種說法很對，凡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都會同意他的意見。

偉大剛毅的民族，應該有一個新的領導觀念。「我們怎樣才能收回我們已被剷除的領土權呢？」霍斯浩佛問。「去尊重並擁護民族自決權呢，還是去反對用來攻擊我們的民族自決權而崇拜武力嗎？」這完全要看民族自決權怎樣去解釋。德國目前所流行的是幾種非常現實的新解釋。

舊政治秩序的破壞也影響到那些只是外表上獨立的大面積。正像歐洲諸小國一樣，舊殖民強國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這是國社主義政治家的看法。據他們看來，非但不列顛帝國已開始瓦解，它的屬國已開始向其它的方向漂流；即法國的殖民地恐怕也難保持完璧。至於那些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小強國，當歐洲大民族被窒息在牢獄裏連一塊最小的殖民地都沒有的時候，自然更不能繼續保持她們的所有物了。小民族有殖民地而大民族反而沒有殖民地這種對照，就是一貼爆炸劑，它會把現存秩序炸得粉碎，而產生一個革命的新秩序。我們且再來引用一次霍斯浩佛的話，「舊殖民強國已不再能樹立遠大的目標了；她們只能根據以往的掠奪，而維持追加的權利要求。」這些強國已不再有足夠的兵力來保護她們的所有物。她們更不能名正言順地保護它們。她們完全沒有上進心，她們堅持權利的理由是這樣的薄弱，這完全說明了現有世界秩序的空洞無物。一個強國，

當她不再能以創造力和超羣的志願繼續不斷地在精神和物質上增加她的所有物的時候，她的讓位時機就已成熟了。且不說舊殖民強國維持她們統治權的物質困難在不斷增加，單只是她們精神上的貧瘠，也已足夠決定她們的命運了——她們既不能採取堅決的立場以殖民地的主人自居，又不能聯合有色人種。她們不但不能用新觀念，在新的統治形式之下，把有色人種的世界，附屬為歐洲白種人的殖民地，並且將使白色人種的統治地位在她們軟弱的手裏失落。只有革命的動力民族才能創造新秩序的原則。這種原則是由意大利的地中海概念演變出來的，而明顯地隱藏在國社主義觀念之中。這種原則將重塑世界的政治建築物，重訂世界秩序，並不僅僅及於歐洲而已。

霍斯浩佛說，民族自決運動「正在摧毀殖民地統治權。最初，民族自決運動只是一個對付德國的撤謊手段，並且認為以後很容易把它結束，但是現在，它已像真理一樣的前進了，已在英法所屬的領土上意氣昂昂地傳佈開來，在摧毀殖民地統治權了。」組織族國的進程，現在已蔓延到殖民地和有色人種的世界裏。「在這千鈞一髮的轉變時期，已沒有辦法開倒車。」「這些大面積現在正在世界上作毫無希望的後衛戰鬥。」只

有新的統治制度和種族意識才能有所挽救。族國和其它大領土形式正在殖民地地上生長起來；它們不但將擺脫白種人的政治統治，並且將擺脫白種人的經濟統治。

世界各地的經濟制度幾乎都已採取了國社主義的形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國的經濟制度已通過礦業國家化，關稅獨佔等手段而復興，藉此謀政治的自由和獨立。各種各色的半主權國家和半主權民族，將藉國社主義的經濟復興之助而向民族革命的路上走去。這些先例將成爲新的宣傳中心，煽動現存的殖民地起來反抗。

這裏所說關於殖民地的一切，如應用於蘇聯，則更爲有力。蘇聯，當作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來看，當然是國社主義勢力的仇敵；但實際上並不僅僅如此。當作一個大領土形式來看，她更是歐洲一個屹立不屈的威脅。民族自決原則也可以應用於蘇聯。蘇聯的問題，只有依照歐洲的意思，那就是說，依照德國的意思，才能解決。德國在上次世界大戰中迫使俄國割讓了西部邊境，這種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割讓是一個大進步，但是它却被戰爭的失敗和布爾希維克獨裁所阻止了。不但蘇聯邊疆的各組成份子應予以解散，並且所有蘇聯的組成份子也必須予以解散，那些組成份子，是德意志帝國的天然領

德國的革命任務囊括東歐西歐，統涉殖民地和歐亞大陸。同時，也包括那在政治上、社會上、人種上、經濟上遠非德國所能匹敵的美洲大空地。日耳曼民族不僅僅是對着一套小小的政治任務，而也面對着一個新的生活秩序。德國是主要的革新的強國。

所謂「革新的」強國 (Renovating Power)，就是從事於改革的強國，所謂「抗拒的」強國 (Resisting Power)，就是僅僅志於保持她們的所有物的強國，這兩者間的差別，是國社主義對外政策最有力的原則。後者不但被斥為軟弱和缺乏生氣，並且被斥為不應該保持那些她們沒有權利可以享有的所有物。這種差別不成問題有重大的宣傳作用。它對目前的歐洲總建設的一個主要弱點下了健全的心理估計。它已抓住歐洲主要問題之一的中心了。多腦河流域的「無的國家」和東歐的「無的國家」，在命運上無

疑地有某些相同的地方，這種同一性，必然會使他們感到和德國休戚相關。霍斯浩佛說得很明白：「中歐和中間歐洲諸國……也一樣的被剝奪了海外和大陸的領土利益……在領土政策上，她們是和德國同舟共命的，她們和德國都在不斷地向同一的定命前進。」

「國社主義已像動力主義似的傳遍了全世界」，它指示我們兩條前途，「不是解放每一個合格的僑民，把他移民到行星上去，使他在向未有居民的自由土地上以他自己的力量去提高他的生活水準，便是把那些未使用的面積公平地重分配給那些已經國社主義化的國家。」這樣，革新的強國就隱隱地成了「天然權利的恢復者。」不用說，「那些保守的強國和有的強國早已備好了各種合法的要求……而天然權利的恢復者將被斥為和平的破壞者。」這些話很可引人鼓掌，從大體上看來，它們的確是很有力的。那些保守產業的強國，將被那些沒有土地，只憑着一個決心闖入世界的強國所代替，這種強國的互代，是「幾千年來世界政治舞台上循環往復的自然程序，」——像英法兩國在新興強國時代從西班牙世界帝國和哈布斯堡王國身上割取土地一樣。只有從顯明的歷史過程中來看，動力主義的革命意志才在對外政策上顯露了它的本質。霍斯浩佛號召動力強國總動員和

武裝起來，這「立功的準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時間準備，使「所有那些存着一顆壞良心的傢伙發生了政治恐懼。」所謂壞良心的傢伙，當然是指那些廣大而未開發的空地的主人。

抗拒的強國

抗拒的強國要保衛自己，抗拒這種新的創造意志，她們能幹些什麼呢？她們除了成立包圍德國的聯合陣線以外，畢竟還能有什麼成就呢？霍斯浩佛說：「她們由於恐懼就成立聯合包圍陣線以抗拒那些對前途有所要求的國家，不論是保加利亞、德意志、意大利或匈牙利。」是重要的「抗拒的強國」是英法。目前依賴於她們的，有「中間歐洲」的諸小國，需要依靠的小殖民強國，斯干的那維亞諸國和瑞士。實際上，凡是新興國家或因上次世界大戰起來的國家都屬於這個集團之內，如繼承國家奧大利、匈牙利、折衝國家波蘭等都是。近東和東南歐諸小國，因為要保全不勞而獲的所有物，抗拒的傾向暫時過

住了動力傾向，但是因為她們都是年青的國家，由於人口的壓力，由於領土的不足，由於貧不聊生的生存狀況，動力傾向已慢慢地興起來了。因此，所有這些獨立國家，這些不滿足的小民族，遲早總會加入革新的強國那方面，這是非常可能的，老實說，簡直是已經確定了的，因為只有這樣，她們才能有一個可以勉強生存的遠景。即使在參加了動力強國集團以後，她們的主權將受限制，領土將因某些疆界的修改而有所犧牲，她們也會願意。

很明顯的，一個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外交政策，是不會真心想和抗拒的強國妥協的。英國最後是否會被吸引到革新的強國那方面去，現在還不能確定。在大不列顛的身體中，有許多細胞還沒有被民主的毒藥所麻痺。英國或許還可能更新她的精神，或許還會找到她的原路，去加入那股猛烈的洪流，去把握住那建立起輝煌的不列顛帝國的統治意志。英國充當抗拒的強國的領袖，是不怎麼樂意的，近年來她的政策所以充滿了這麼多的矛盾和弱點，無疑地是爲了這個原因。新德意志的領袖們正在不斷地努力，以友誼的忠告和威脅並進，想使「漸近的」英國在「適當的時機蛻化」爲革新的強國。英國民族

在和動力主義接觸以後，就會恢復它的康健。那些有的國家是不能發育的，她們的思想和政策都被古板的法律條款束縛着。她們已自絕於大勢所趨的創造生活，她們不可避免的命運是滅亡和破產。她們的政策是提心吊膽地黏附在她們的所有物上面的，是消極的，沒有理想的，是防禦性的。在那革命運動不斷地進行的世界裏她們將自動地愈變愈弱。她們的抵抗就是失敗的第一步。自絕於擴張就等於自絕於生命。因此那些抗拒的強國，「金圓主義的民主國」，是命定了要瓦解的，她們的權勢是命定了要移轉到那些能利用它們來做些有用的工作的強國手中的。

統治制度的新原則

統治的條件是什麼？去統治大面積，如用有的國家所嘗試的統治方法，不用強硬手段，沒有統治意志，不帶世界使命的氣息，是可能的嗎？霍斯浩佛的回答是：要有了「統治外國領土和外國人民的意志」，才能產生世界使命的氣息和統治大面積的號召。

「抗拒的強國是否有這種統治意志」頗成疑問，「缺乏統治意志是抗拒的強國的重要特性，這同時也說明了她們的猶豫和懦弱。」霍斯浩佛說，已成立的世界帝國中，「除了帝國的觀念或經濟剝削的觀念以外，還存在着一種哲學氣息或宗教氣息的世界使命觀念」；世界帝國要是沒有這種觀念，那末，一切精力都會很快地消耗盡淨。統治大面積的能力的兩種象徵——統治意志和世界使命——有的國家都頗缺乏。但這兩種象徵在動力國家那方面却是很明顯的一個民族的擴張，是它康健地生長的自然表現。」

英國有老練的統治者，她的體疲和衰弱不過是暫時的吧了，所以德國願意帶着統治制度的新原則作毛遂自薦。國社主義無疑地正在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假面具後面製造新統治原則。它要給殖民地統治者的腳下填上一個觀念基礎。我們甚至可以說，新德意志的政策在某些現實主義的英國政治團體中還得到了讚賞，這種說法實非過份。因為和平等原則，民族自決權，民族退盟權，以及一切縱容寬忍的民族思想及宗教思想等足以削弱不列顛帝國的原則比較起來，新德意志的政策表示了一個明確的統治意志。國社主義的對外政策可以同時代表兩個要素——新統治原則和破壞主義。它要完全摧毀有色人

種世界裏的民族自決權和歐洲統治。德國人的言論表示得非常清楚，爲德國本身的利益打算，德國的使命是到殖民地去做無產民族的領袖，她將以新統治原則作護身符而以統治人種自居。

人種原則現在還只是在猶太人身上發展，它供給了無窮盡的實施專制的好機會，並且給現實主義者在殖民地稱霸的意志填下了一個觀念基礎。只有根據了人種原則的基礎，才能在理論上鬥敗民主觀念。只有這個基礎才能使意志發生力量，才能橫行霸道，才能踢開一切「人道主義的傻瓜」，才能統治大領土和保衛白色人種在世界上的特權地位。這種新政治原則將減輕統治的工作。這種人種原則，這種人類和種族不平等的原則，把幾世紀來那多情善感，帶着女性的情感的統治人種安格魯·薩克森所累積下來的癡情一掃而光。要是她們還以爲担負「白種人的負擔」是她們的特殊使命，那末，想輕鬆她們的任務，最好莫過於在新人種原則和動力國家的新統治原則上轉轉念頭。

從這個觀念的觀點上去認識固執的反猶太主義，把它看作一個新統治政策，那末，我們就可以恍然大悟了。我們必須把一般民衆的觀念和國社黨中心份子的特殊解釋分辨

清楚。黨衛隊和挺進隊的領袖們慎重地認爲反猶太主義是一種「統治手段，」猶太人是有色人種，是被歐洲社會擠棄的民族，是在政治上被剝奪選舉權的「下等人，」以對人的態度去對待他們，是不配做統治者的明證。我們可以對他們冷淡無情和極端殘酷。慈悲和憐憫一概用不着，我們得打疊起一副殘酷的心腸，而且，這樣做可以說是問心無愧的。

德國有殘忍的權利——大德意志常常毫不含糊地這樣宣稱。「法蘭西，那個垂死的民族，將被我們打得永世不得翻身，我們是要這樣幹的！英國，要是我們幸運的話，可以把她降爲一個無害的島國。」——克拉斯（Clas）這樣規定德國的作戰目標。但是我們也不要也用這樣愚蠢的辭句來解釋新統治原則呢？霍斯浩佛曾小心地把新殖民政策的風度作了一個速寫，他說，這是一個既不壓迫又不剝削的政策，它的目的，只是在求得公平的領導地位吧了。真的，領導有色人種，用不着古老的「信託制度。」國社主義的政治家辯護新殖民政策是一個減少人口的政策。和新殖民政策連帶使用的，還有「對換人口」一法，就是用行政措置去除掉少數民族。這種毒辣的手段現在實際上還只僅

僅應用於猶太人，下一次，我們或許將看見它應用於剝留在波希米亞的捷克人口；因為國社主義者早就計劃想把捷克人遷移到西伯利亞，以使用一個堅固的日耳曼社會去據取殖民地。

世界權威意志的統治

新的統治者，世界的權威，世界的替身，世界的主宰——德國對外政策在原則上要做到這步田地。它的目標並不是一個大德意志，它並不以中歐秩序一份子的地位為滿足；它決不是霍斯浩佛的「大陸」計劃所能限制的。鼓勵德國人活動的，是那身居世界領袖的信仰。霍斯浩佛描寫新德意志的中心政治目標說：世界使命的神祕信仰……在時斷時續的邁步的壓力之下，把內在的力量鍛鍊得空前地強勁，以備在必要的時候造成蓋世的功績。世界各強國已經開始在老大強國的隊伍裏打出路，向着她們的目的地前進，我們沒有很多的時間，我們不能讓精力錯用，讓時間空逝，要知道我們帝國和我們同胞

的幾世紀或永久的命運，將在行將到來的總清算中決定。德國所處的形勢不讓日耳曼民族在政治上有選擇的機會。在我們今日的世界政治圈內，運動是比靜止或保守狀態更為重要。

霍斯浩德說，德國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被人阻止她的「發育完全」。早在中世紀初期，日耳曼帝國就開始了那現在可以從不列顛帝國身上觀察到的瓦解過程。德國在波羅的海領土問題上，始終沒有得到過滿足的解決。過去，尼柔蘭脫離日耳曼帝國而獨立，弗里明移交給羅馬帝國，瑞士被割，但澤被割，舊日耳曼聯邦帝國因為缺乏統治意志，所以加盟國都紛紛獨立，帝國終於因此崩潰。國社主義者從德國的過去得到一個教訓，知道要阻止瓦解，只有實施嚴格的集中化。在德國歷史學者看來，不列顛帝國的發展，似乎就是舊日耳曼帝國錯誤的一個重覆。第二帝國，即俾士麥和威廉二世的德意志，曾極力避免那個錯誤。國社主義予日耳曼民族以一個帝國的野心，它以為這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威廉二世的德意志曾用打蛇打在七寸頭的手段，威脅過不列顛的生命。但是她缺乏一個使命的真實氣息。現在，日耳曼民族已有一個使命了，它的中心觀念就是

自以爲是上帝特選的人民，担負着一個無所不包的永久任務。德國已不再威脅不列顛了；她所以能奪得領袖地位，是因爲不列顛帝國已衰弱疲。戰前年青的德帝國主義，曾企圖用不因移民國外而不斷地喪失人口的方法去解決迫切的人口問題，但日耳曼民族統治世界的新意志，却要用重訂世界秩序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當然，重訂世界秩序是得由日耳曼民族來領導的。

日耳曼的新生命像新生的幼芽裂開最堅硬的石塊一樣地在突破敵對強國的種種抗拒。但新生的種子決不會長成十九世紀末葉那種形式的帝國主義。所以新秩序的範疇現在尙難於想像。它不想造成一個由一個民族統治全世界的帝國。這個世界使命得由一切民族共同去完成，在一個特選民族嚴厲的訓練和領導之下，共同去建立這個大功。處於領導地位的世界強國，在未來的新主宰中，用不着那以經濟剝削爲基礎的帝國主義自由思想。舊調或許會重彈。但那些患重聽的人，却不能在舊調裏聽出異常真摯的，有魅力的，激動的新情緒，他們不能聽出這裏面在大叫世界重分配，大叫德意志的使命，在斥罵英國爲昏庸的偽君子，在咀咒法國已「壽終正寢」。

怎樣才能建立一個新的大帝國呢？

要組成一個新的大帝國，那作為中心的大國，必須把被保護國或同盟國在她的四週編成一個花園。只有在這步工作做好了以後，才能談到什麼世界法庭。瓊格（Ernest Junger）說得真不錯，「國際聯盟目前正在那兒演可憐的滑稽戲」。一個真正的國際聯盟將在新的強國——有實力，能集權的強國——週圍生長起來。

我們對於國社主義的政策，必需把它的理論和實際分辨清楚。國社主義的實際政治目標是一個沒有民族界限的支配權。認識了這一點後，對奧大利和蘇台德區之重併就可得到完全不同的新見解。希特勒曾在一九三七年國社黨大會的閉幕詞中，曾羅漫蒂克地公然大呼：「日耳曼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真已出現了！德國歷代奮不顧身的愛國者所朝思暮想，鞠躬盡瘁的目標現在顯然已達到了！」但這不過是宣傳家的偽裝而已。實際

的目標却大不相同——却在繼續擴張領土和增加權勢。希特勒正在把奧大利轉變成目前的德國，把奧大利人民造成一羣痛苦和服從的臣民，造成動力主義的工具。德國的中產階級，大多還以為國社主義的民族主義和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國社主義不過剽竊了一些別的觀念，加些新花樣而已。其實，國社主義的大德意志，決不是我們祖先所能了解的。早期的民族統一運動，領土擴張運動和大德意志運動，是一種求解放的運動，是日耳曼民族的自由結合，對外族仍抱尊重的態度。而目前的民族團結，即「民族協同體」，却顯然是一種在監視束縛之下的團結。這和民族解放和個人解放完全無干；相反的，它却是最嚴厲的紀律和劃一，硬要把民族和個人造成一個類型。它等於在要求支配權，要把各民族依照它的人口和權勢分別等級。它等於在強權的統治。在民族協同體內，沒有自由發展，只有實施主宰的中央強國和圍繞在它四週的附屬民族而已。大德意志不是歐洲和平的中心而是一個未來大帝國的出發點。它最後的要求並不是民族自保而是世界支配權。在這個冒險的追求中，日耳曼民族又將斷送它自己一次。

在這些活動裏面，並沒有什麼空想，虛幻，雅氣和羅漫蒂克的意味。相反的，它却正在冷面冷心地利用敵方的政治口號，以先下手為強的方法打倒任何合理的反對，藉此建立國社主義的權勢。它以這種方法擴張它的權勢，當然不是那些站在和平會議裏討論族國原則和民族自決的國家所能非難的。大德意志的一切目標，都集中在擴張權勢這一點上。第三帝國將不斷地實施擴張政策，直到她的老拳能一揮而擊中舊秩序的心臟為止。在推行這個民族政策的時候，希特勒或許會為某些羅漫蒂克觀念所激動過，但重要的是事實，而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以民族運動為幌子的欺詐政策。

霍斯浩佛說：「德國的政策正站立在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陰影裏，正像羅馬帝國的大陰影朦朧地出現在新意大利的背後一樣」。他認為這個陰影橫在東歐的，不及橫在西歐的為多。（即使我們不把法國算在裏面）它至少籠罩着日耳曼民族的語言國境而遠超過第三帝國國境和日耳曼民族的防禦線，所謂日耳曼民族的防禦線，包括弗蘭脫——德屬比利士——魯森堡——德屬阿爾薩斯和勞蘭。除此以外，還籠罩着……目前屬於法國的西弗蘭脫，布根台等地。抗拒的強國深恐這些被陰影籠罩過的土地將完璧歸

趨，這種恐懼，是她們政策中的一個重大因素。但日耳曼帝國的勢力將復聚，它將一直伸展到地中海；具堅康和里昂是帝國的城市，薩夫是帝國的一個重要借道國，瑞士……是帝國的一部份」。要是根據了羅斯浩佛這個大德意志的輪廓，我們就可以知道，國社主義的民族聯盟，決不是僅僅與意大利和蘇台德區的合併所能完成的，那些散佈在德國邊疆上的幾小羣日耳曼人，自然是更不用談了。國社主義者的要求，是組一個以日耳曼民族為基礎的歐洲帝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完成日耳曼民族的統一：用不着什麼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國際聯盟，用不着那患腐血症的泛歐主義，只要一個大德意志就夠了；凡是日耳曼血統的民族，只要它把政體調整到國社主義的統治形式，都可以依靠大德意志。那就是國社主義者完成日耳曼民族的統一的概念。

在這個概念的創造者看來，這個統一的完成並不需要經過許多殘酷的鬥爭，甚至連一個都不需要的。其他國家必須認識這個大德意志帝國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在她的組織過程中，他們只要平心靜氣地旁觀着好了。

要是意大利沒有什麼動作，國社主義的歐洲革命和德意志的復興就無法進行。這個發展似乎是完全由於某些機會造成的，意大利現在所以能成爲那支配世界的軸心之一端，或許可以說是由於民主國家的錯誤促成的。但這僅僅是由於機會嗎？霍斯浩佛在不久以前曾問過：「意大利的形勢怎麼樣？她將往何處去？她是否真像她的法西斯主義所宣稱的那樣完全是一個革新的強國，抑或是將被地中海形勢逼回到舊殖民強國的隊伍裏去參加國際聯盟呢？」但意大利並不能單獨發展成一個革新的強國。因此，德意兩國的會合，對兩者都有決定的重要性：他們的結合是不能代替的，或許也是不能拆散的。意大利給動力主義發明了政體，行動的節拍和內部統治方法。而德國則在對外政策上首先造成了偉大的革命任務的自覺心。只有兩國聯合起來才能有大規模行動的機會。要是沒有這個軸心同盟，德國的突進將產生一個在本質上大不相同的局面，關於這一點，德國



國內却很少有人論及，這表示整個政策的基礎是多麼脆弱和不穩。

希特勒對德意聯合工作的遠見頗足驚人。墨沙黑尼最初接見他的時候，幾乎帶着輕蔑的態度，但是他並不因此就罷手，他甚至並不深究自己在情感上所受的創傷。德意同盟的追求者，不成問題是日耳曼民族的動力主義。希特勒的追求終於成功，無產民族反抗富有強國的聯盟終於成立了。德意同盟成立以後，德國就放棄了那毫無結果的修約政治談判，決心要完成世界重分配和重訂世界秩序。

「未來歐洲教育」的分離「細胞」或分離點，是霍斯浩佛在論及動力主義的利益問題時所創造的名字，其中包含着立陶宛問題，匈牙利問題，和烏克蘭問題。與這些分離點相對照的，是那些現在又獨立了的小民族集團。「自決權」僅僅是一個原則，它必須以自決能力為前提，而那些「小國家」却不能顯出任何自決能力來。凡是「人口稀少，生活形態受到空闊束縛的國家」，如大多數「歐洲中間地帶的國家和東歐諸國」都屬於這一類。東歐及中間歐洲的那些可憐蟲，他們所以無法與德國接近，完全是由於西歐列強的作梗之故，因為西歐列強不明白這些「小國家」缺乏自決能力。因此，霍斯浩佛要求

對自決權和自決能力這兩個概念予以慎重的處理，因為它們能給你許多成功的機會，但或許也會揭露出你非常危險的弱點。

霍斯浩佛又論到動力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分離點，對於這個分離點的處置將影響到蘇聯，波蘭，捷克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他把這個分離點稱為「碗櫃中的枯顛」——就是「烏克蘭問題，立陶宛問題和小俄羅斯或赤俄問題。」這些問題和俄，普、奧之瓜分波蘭有同樣的重要性。他簡潔地說：「要是烏克蘭問題能有任何新的解決，其所影響之領土，勢必及於歐亞兩洲。」因為四千萬烏克蘭人「只有一小部份在波蘭，捷克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而最大部份却以半獨立狀態存在在蘇聯境內，」他們決不會在各大強國反蘇維埃的遠大目標中扮演一個脚色。德國在上次世界大戰時，就想用武力造成以伏爾加河作背骨的大俄羅斯國和以地尼泊河作背骨的烏克蘭國。早在一九一七年，德國東線的司令就在宣傳文件裏宣稱過，誰要是想解放德國，永遠免除俄羅斯的威脅，他就必須在烏克蘭問題上轉轉念頭，去喚醒那個國家，使她獨立，但同時又決不能讓她與波蘭有任何的結合。我可以在這兒順便提一提，這些觀念是早就有了的，在克里米戰爭時也會被討

論過。那時，他們的目的是在遏止俄國的侵略。

歐洲未來的動力發展都要服從自決能力和自決權那兩大原則。這真是公道政治原則的一種巧妙手段。它可以把暴力解決粉飾得和氣一團。這兩種原則都各有其妙處。——

日耳曼民族在捷克斯拉夫發生問題時，得引用自決權原則，而日耳曼民族在白俄羅斯或斯拉夫這種「小國」家裏發生問題時，則要引用自決能力原則；甚在捷克人在波希米亞那種尾巴國家發生問題時，亦可引用自決能力原則，因為除去了日耳曼民族，剷除了斯拉夫人，這個殘缺不全的波希米亞就只能在德意志帝國內作一個附屬的小國家了。巴黎郊外訂立的條約並沒有建立起永久的秩序，却只建立了一個虛幻的，而目前正在崩坍的希望。凡是革命的動力意志存在的地方，或是說，凡是能摧毀舊秩序的地方，都散佈着未來的發育細胞。凡是「被驅去生存空間的國家」，將來一定會有「發展的機會」，這種機會只有沒收了「過分大的面積」之後才能得到，或是，要合併了那些獨立的「小國家」之後才能得到。那些「小國家」不能給她們自決權，因為她們根本沒有自決能力。

回溯上次大戰時期的政治觀念，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國社主義目前對東歐的目標。西林教授（Professor Seiring）在一九一七年出版了一部書，討論俄羅斯西部對中歐發展的重要性，在那本書的結論中，他說，建立一個帝國實非德國的本意；「德國的本意却在聯合歐洲各國，使她們環繞在幾個被戰爭磨鍊得很堅強的核心週圍，聯合保衛她們的獨立。這個防禦同盟奠定了權利平等和弱小民族自由發展的基礎」。在日耳曼民族的核心領土上，第三帝國將組成一個聯邦政體的國家，在這個領土以外，第三帝國未來的政治活動，將以平等互惠為原則。

聯合保衛這些國家的獨立的「堅強的核心」，當然是大德意志，其疆界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曾經過一次修正，一九三八年九月又經過一次修正。國社主義的國民訓練和新統治原則加強了這個核心。經過這樣的加強以後，大德意志對所有來聯合她的國家，

已能給予真正的支持，並能保證她們的獨立，只是對她們稍稍加以羈束而已，集體保證所給予的保護，只是紙上談兵，一遇到動力國家的「現實的」侵略，它就原形畢露了。但在聯合保護和聯合防禦的同盟裏，德國強有力的保護和保證，却確能安定諸小國所日夜焦慮的危急情勢。

西林又說，「那些互相依賴的鄰近民族，當更進一步地合作，以經濟同盟完成防禦同盟」。『經濟同盟大部份可以用富於彈性的經濟自由合作形式來達到。』在新秩序的核心初步完成以後，德大概將循着同樣觀念把東歐和近東澈底地改組。這種努力正像在德意志聯邦內建立關稅同盟同樣完全是和平的奮鬥。一方面加以壓迫和威脅，一方面又給以物質利益，這樣就可以很快地使那些國家因形勢困難而服服貼貼地來歸順。西林在二十年以前，已經把防禦同盟的任務和它對未來和平的貢獻說得很清楚了。他說：「要保衛那正在建立起來的帝國的安全，要在權利平等的原則上保證各國的共存共榮，除了建設一個經濟上，軍事上，以及海上的永久均勢以外，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要新的聯邦國家組成以後，國社主義就可以在東面防禦世界革命的威脅，西面阻止腐朽的自

由主義侵入了。

德國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在遲延以動力主義解決東歐問題和北歐問題。所謂東歐問題和北歐問題，決不僅限於但澤問題一端，而包括米美爾，立陶宛，波羅的海諸國和芬蘭在內。德國的第一步工作，先要保衛波羅的海諸國和「反蘇外圍國家」的安全。但就在這一點上已發生了一個大問題，就是那影響德國北方安危的波蘭，是否會因她「地理政治」的形勢而發生德國同樣的趨勢。波蘭能允許立陶宛落在德國的勢力範圍以內嗎？波蘭在這方面的衝突，能像德意在多瑙河流域一樣的得到和平解決嗎？這只有在波蘭堅決地參加了動力陣線以後才有可能，很多人認為德波在某某數點上已經成立諒解，說德國需要的是在東南歐方面發展，因此歐洲東北部和南達多瑙河的德蘇中間地帶將任憑波蘭去發展。我以為這些意見未免說得太過份了。但波蘭將來是否會成爲軸心國的夥伴，德國是否會對波蘭表示友誼態度，這對於歐洲的前途，確有很大的影響。

但澤和波蘭走廊的命運已不再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困難的問題，是波蘭自世界大戰到現在已有了基本的變化，她的人口基礎已足夠使他擠入大國之林。把她併入「防禦同

盟」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小。她自己也想成爲一個大強國，她有她自己的，非常明確的目標，她至少也只能參加一個擴大的軸心。她的權利即使不能和德意兩國相等，至少也得予以明白的承認——允許她循着她自己的「地理政治」路線發展。

但是，允許波蘭在東歐成爲一個大強國，是和希特勒的「聖經」衝突的。希特勒會在我的奮鬥裏宣稱，他決不「容忍」東歐有一個二等軍事強國的存在，他不能在設計使西歐最大軍事強國法蘭西自動投降的時候，却又允許東歐再興起一個軍事強國來。

一個建築在軍事基礎上的新同盟，中心強國如要向所有的同盟國執行嚴格的領導權——且不說支配權——則她的兵力必須佔壓倒的優勢才行。要是在領袖強國之下還另有一國大強國，它的週圍也環繞着許多小國，那末，舊德意志聯邦中的普奧歷史關係，就會重演於今日了。所以儘管有那麼多的領土保證，德國遲早總是要使波蘭退爲一個僅僅具有一千八百萬至二千二百萬人口的人種疆界的。

這個防禦同盟的新聯邦原則，也適用於西歐和北歐的赤道國家。「日耳曼民族的新條頓帝國」將把東歐和東南歐的「半條頓碎片地帶」以及北歐條頓族的發源地都包括在內；此外，她也包括了舊神聖羅馬帝國的諸邦。在碎片地帶，歷史的過程已促使這一地帶的國家分解為許多最小的民族單位，要在這裏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觀念是不可能的。一個國家的成立，至少要具有兩種要素，就是壓倒的軍力和國社主義所代表的那種特殊政治意識形態。北歐諸國的情形却正相反，過去的歷史過程還可以很明顯地從她們身上辨別出來；這些國家之所以能保持獨立，是由於敵對大強國間勢力的平衡。所以，當一個壓倒的勢力出現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地會失去她們的獨立地位。第三帝國的新勢力，企圖在這裏把古老的化石因素提鍊成新秩序的活躍分子。因為要把這些國家從孤立的小生存空間裏解放出來，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合併。

日耳曼核心帝國的東，西，北三面，都環繞着半主權性質的族國。她們全都依賴那居於她們的中心的國家。她們得受中心國家的推動。她們不再是個別的國家；她們已組成了一個集體。各個份子不是一個「同盟國」，不是一個聯邦；依照國社主義對內政策的正確解釋，它將是一個「追隨者」。這個同盟的紀律，不是用自由協定的方式得出來的，而是由領導權和絕對權威造成的。在另一方面，這個同盟的會員國却可以得到很大的物質利益。同盟中某些國家所帶來的殖民地，將為全體會員國的福利而使用。因成立同盟而獲得的大面積利益和豐富的原料品，也將同樣由全體分享。政治權利的犧牲將由經濟利益方面得到補償。對這個發展表示歡迎的國家恐將不少，尤其是現在這個四年計劃成功以後，納粹政權的社會政策大放光芒，羣衆的生活水準提高，那時，歡迎這個發展的國家將更多了。

這個發展其實就等於在領土上和精神上把歐洲融解掉。居於領袖地位的幾個國家——英法——將自己消滅。意大利將在地中海區自己去組成一個帝國，而自任爲這個帝國的核心。歐洲將不再存在了，國社主義政策正處心積慮地要摧毀歐洲的歷史統一，政治

統一和經濟統一。

毀滅歐洲政治的觀念是有它的邏輯根據的。因為只有豎起這面大纛才能給領土合併打開一條全新的出路，不為歐洲大陸所限制。第一個完全在歐洲以外的領土上樹起它的權威的，是不列顛民族。所以，根據國社主義的看法，英國是突破歐洲精神束縛的第一個歐洲強國。還有一個不屬於歐洲的強國是俄羅斯。但是從政治上講，俄羅斯並不是從歐洲突破出去而是被趕出去組成一個亞洲強國的。豎起這個毀滅歐洲政治的大纛，國社主義就可以引用歷史的先例了。席勒（Zehrer）曾說，戰前政治制度最堅實的城堡，是各大強國的一致性和權利平等的觀念；而國社主義毀滅歐洲的精髓，則在於不承認一致性或權利平等為政治秩序的必要原則。因此，那以宣稱與富有強國權利平等為幌子而重入活躍的政治舞台的德意志，却變成了一個否認權利平等與政治原則的國家了。這個否認決定了她對弱小民族的態度，摧毀了那不論軍力和人口而以各民族權利平等觀念為基礎的歐洲政治建築，也摧毀了那已被上次大戰撼動根本的歐洲各民族的一致性。或許我們可以把它倒過來說，正因為權利平等和一致性妨礙了國社主義走向新世界帝國的道

路，所以那作爲一個政治實體的歐洲才必須使之毀滅。

世界的 新 輪 廓

世界的新輪廓在目前是否比較清晰了呢？要是認爲國社主義的政策只限於中歐，中間歐洲，近東以及德國東西邊境，只限於日耳曼民族，這是一個錯誤，德意日集團揭露了與這大不相同的政治傾向。她們要瓜分整個地球，要是拘泥於我的奮鬥和東進政策，則對於國社主義政治目標的範圍，將會產生妄誕不經的錯誤觀念。我們可以十分確定地說，第三帝國的政治領袖們早就看清日耳曼民族的臉在一百年以前就已轉向西方了，雖然普魯士拓殖委員會在東歐殖民上下了許多工夫，但卽在上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也早已放棄了在東方獲得領土的觀念。我們要是以爲德國的東進政策會在俄羅斯或西伯利亞草原裏建立起一個德國殖民地，那純粹是烏托邦式的空想。都市化的德國人，已不再能担任那種艱苦的勞働去拓殖那文化水準低下的東歐大空地。可能的發展，或許是用外族

人的勞働去經營德國式的大規模耕作；或是去發展工業；或是在法國東部或北部那些人
口稀少，經濟和氣候都得天獨厚的區域去作農業殖民。帝國主義不會使人民回到田間，
至於在統治民族是如此。

從國社主義的許多新概念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徹底改變的世界新輪廓。北非，小
亞西亞，近東，似乎自然地傾向新地中海帝國，東歐，北歐和亞洲北部傾向德意志帝
國。而南非，中非，南美和太平洋方面，新帝國路線也並非沒有發展的可能。

第三帝國有兩種計劃需得提出來加以特別注意。這兩種計劃並沒有被當作宣傳的主
題而大吹特吹，但是我們可以從政治領袖所作的重要言論中推斷出來。一種是陸上擴張
計劃——從多瑙河流經土耳其，小亞西亞到印度。還有一種是「地理政治」路線所指示
的，就是從夫路輿到海參威。這兩種計劃的目的，都是爲了尋求原料品，尋求主宰國或
大帝國的戰略據點和經濟據點。第一種計劃會和意大利的野心衝突，除了德國的老民族
主義者和保守黨徒以外，很少有人信從。第二種計劃是和英意共同分割利益，並且把英
國也拉入革新的強國的集團裏。第一種計劃如完成，則不但法國要受犧牲，而英國也要

受犧牲；第二種計劃却會給世界重新分配打開一條道路，並且會把英國拉做夥伴。世界重新分配的輪廓大約會循着這些路線發展：不列顛世界帝國，在海外發展；意大利的地中海——非洲——小亞西亞帝國，領有法屬非洲領土，大阿拉伯，以及所有地中海沿岸的領土；最後是美洲的大陸集團和日本的太平洋帝國。

國社主義者最近已準備允許英國做一個夥伴，允許她以平等地位參與世界重新分配，但法國却不許參加。在國社主義者看來，只有德國，意大利和英國才是相差不多的等級歐洲強國。她們的領土和野心可以不起利害衝突。在德國的領導之下，歐洲將併入歐亞聯合大陸之中，而地中海區則將為意大利所獨佔；英國要被趕出歐洲，放棄歐洲問題的利益，退出她一度曾為歐洲島國的地位，而將她的帝國完全遷移到她的海外領土上去。英國是否需要宣佈她對地中海，小亞西亞，阿拉伯和北非等地並無利害關係，可以由意大利去決定。像西班牙和希臘這種國家，將完全落在意大利的勢力範圍之內。法國和瑞士將削減領土而喪失其國家單位的資格。其他如南斯拉夫等國家，將脫離雙重勢力範圍而併在意大利一個勢力範圍之內。

這是龐大的對外政策的幾筆粗線條；粗粗地描出了獨裁政權大廈的輪廓。在那阻止德國重整軍備的戰爭聲勢洶洶的時候，凡是聽到這個計劃的人，都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種荒謬絕倫的一種牛皮。我承認那時我自己的確這樣感覺。但現在，它似乎並不像不能實行的了。

要實現德國領導的大陸聯邦，先得把蘇聯目前的政體瓦解。這個目標需要意識形態的偽裝，必須把羣衆的熱情激發起來，並且必需要獲得幾個同盟國。在進行準備動作的時候，必須轉移對方的注意。因為要瓦解蘇聯，必須先瓦解法蘭西紙老虎，必須摧毀法蘇的「外衛」捷克斯拉夫，必須孤立和瓜分法國。與上述幾個步驟有同樣重要性的，是對中間歐洲赤道地帶的諸國加施壓力，以便在瓦解蘇聯，形成一個新的歐亞大聯邦之前，建立起一個新的共同機構。除了少數的例外，德意志帝國準備在某種限制之內，維持參加聯邦的國家的存在。

但是——這個但是必須牢牢地記住——要是國社主義不能達到它在中歐和西歐的初步目標，不能孤立和瓜分法國，不能把英國拉入革新的強國所組織的陣線，那末，它將

反過來和布爾希維克的蘇聯聯合，從相反的地極去瓜分世界。有許多著名的政治家願望有一個這樣的解決，以避免在中歐和西歐的時間損失。要是蘇德一旦聯合，則西歐列強和各小國就不得不俯首投降。從對內政策上講，也有很多動聽的理由。總之，動力主義知道反轉臉皮和蘇聯聯盟，是一個產生不可估計的革命效果的最後機會。

但這兒還有一個問題：動力革命能以瓜分世界爲止境嗎？對外政策的生存鬥爭不會繼續下去，直到最後由一個民族支配世界嗎？凱撒主義時代的三國瓜分世界，不過只是獨霸世界的最後鬥爭的序幕而已。在德意志大陸帝國的背後，正屹立着那獨霸世界的雄圖，這個雄圖的技術工具已並不缺乏了。荷蘭與比利時被佔以後，英國就成了一個跛腳的歐洲強國，所以不列顛帝國將難逃崩潰的命運。意大利呢，即使她成了一個廣大的地中海帝國，也不足與德意志聯邦鬥上一個回合。至於美國，現在已由於意識形態鬥爭而內部開始動亂了。美國的變動現在雖然還看不到，但也會很容易地到來的。反對者的美國將自願轉變爲國社主義的門人弟子。在國社主義者看來，美國的政治情勢頗爲不穩，並且立刻會爆發革命；國社主義促進這個革命有兩種意義，從戰術目標上講，它可以使

美國與歐洲隔離，從政治目標上講，它可以把北美和南美都誘引到新秩序裏面。國社主義正在用威脅全世界的職術準備佔領各種據點，以統馭殖民地，統馭各大海上路線，統馭美洲和太平洋。至於建立一個鞏固的中非殖民地的企圖，德國也是早就有了的。這一切說明了爲什麼國社主義厭惡英國的態度愈來愈利害，這比一九三八年張伯倫企圖阻止希特勒的侵略所引起的單純的反感要深刻得多。瓦解不列顛帝國已經明白白地例爲國社主義世界革命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了。

當哥德在凡爾美聽到大砲的隆隆聲，看到聯軍停止攻擊和後退，他就知道他是處在世界歷史的一個轉向點上。當德軍開入萊茵區的時候，法國人不是有這同樣的感覺呢？要是有的話，那麼他們比哥德是理智得多了。因爲他們不過是首先遭難的人而已，不但作爲一個強國的法國西要消滅，作爲一個強國的不列顛要傾覆，而且整個歐洲都要解體。但德國人所欣舞驕傲的就是這一點嗎？不，在他們的新世界裏不但歐洲要消失，各大個別國家要消滅，而德國本身也將隨着她們的消滅而消滅。

第三章 向革命邁進

實 際 問 題

關於國社主義的計劃和目的，關於所有這些政治武器的軍火庫，一定有不少人抱着懷疑的態度。他們會問，這些計劃和目的在實際政治上究竟佔着多少比重呢？他們以為所有這些披着科學的外衣，用德國教授的風度提出來的「地理政治」原則，不過是給擴張領土的政治目標造出一種理由，去誘惑一部份受過教育的德國公民，使他們自願為民族的利益而犧牲吧了。世界重分配，一個從夫路與到海參威的大帝國，這種烏托邦在宣

傳上或許是有用的，但決不能把它們認爲是真實的政治目標，任何政治家決不會認真地把它們看做一回事。那末，試問國社主義真正的政策，它的粗線條又是怎樣呢？

說起來，這種驚人的坦白正是獨裁外交政策的本質。事實已經證明它並沒有撒謊。那是一種幾乎不可能的，令人難以相信的因果關係：公開宣佈真正的目標證明是最好的僞裝。

我提醒諸位，我是根據經驗來說這句話的。雖然我極力警告自己，但是有好幾次我不得不被迫承認急燥妄動已在德國對外政策上完全取得了勝利。有些人忌諱以最坦白的態度揭露對外政策的目標；斥之爲「自取滅亡」，這些人以爲旁人也像自己一樣，都在非常注意地聽取他們的一字一句。國社主義宣傳家的戰術，就是把納粹政權的目標儘量暴露，使人人皆知。外界人士以爲誰要是真抱着一種政策而又自己把它宣佈出來，除非這傢伙是一個極蠢的傻瓜。但這並不是愚蠢，這是最狡猾的詭計。這正像我的奮鬥中最著名的格言一樣有效，那句格言就是——撒謊要是撒得非常大，就能使人相信。真理要是非常真，就要引起人的懷疑。

國社主義的政策，與民主國政府的祕密外交和苦心防範的輿論比較起來，的確要坦白得多。我們必須確信上述的一切目標和傾向，是代表着真正的實際意向的，尤其是世界重分配那個主要目標。那個目標聽起來很簡單通俗，而難於把它看作實際目標，它似乎決不能代表納粹政權真實的目的。這就是解釋國社主義政策困難的所在：對於它的主要原則，沒有合理的方法可以去研究。

我還願意在這兒提一提某些我親自接觸到的實際問題，藉此闡明國社主義的革命路線。第一，我必須告訴諸位，我們這些在納粹政權之下工作的人們，不論是國社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或保守黨黨員，最初都毫不明白企圖採取或甯可說不得不採取的方向。在那些非國社主義者的關員，外交人員和處於負責地位的內政人員之中，究竟是否有人對自己所追逐的方向表示懷疑，這一點，我還不能斷定。我不能肯定其中有人確抱這種態度，因為凡是會轉轉腦筋的人們，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已明白的看出國社主義所走的路線的了。或許那些過去會反對這個路線的人，因為它已為民族爭取某些勝利，因而消除了對國社主義革命的憎惡態度。至於我自己，因為漸漸認清了國社主義政策的破壞傾向和

愈益增張的急進化，終於在但澤和它斷絕關係了。第三帝國國內各方的態度，即使在目前，還是非常紛歧。有些人期望軍隊以強力來實行一個轉變，至於那些讀成比較理智的政策的人們，則覺得坐在辦公室裏修正過份冒險的政策，是他們的特別義務。這些態度是很聰明的，但是他們錯了，因為他們忽視了這一運動的革命性。現在所需要的人，是以一個堅決的立場來反對它，及時發動一個反國社主義的革命。

德國要擺脫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和恢復她在歐洲應得的地位，有兩種可能的辦法。一種方法可稱為歐洲式的解決法——德國表面上成爲歐洲的主人翁，但並不能真正決定國際聯盟和某些條約。這將使德國成爲東歐諸小國的領袖，但用不着那些擅自取得世界法官地位的西歐列強來加以保證，或訂立任何「東歐羅加諾」式的條約。日內瓦的集體盟約制度，給中歐和東歐造成了一個永遠不寧的局面。只要德國和她的隣國雙方自己訂立幾個條約，互相承認對方的疆界，或以和平的協定加以整理，並允許德國對條約之一方建立她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影響，那末，戰爭的危險就可以避免。德國雖放棄修改疆界的要求，但可以得到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這是很正當和合理的。

或許有人要反對，以為這正是國社主義政策的目標。但要是國社主義真的採用了這個政策，德國是永遠不會失敗的；可惜它已給一個完全不同的革命政策所代替了。將來的主要問題，是在於德國所追逐的政策，是否會有這種政策的精神調和在裏面；究竟各同盟國能得到平等的條件，德國的夥伴能得到完全的主權和完滿地分享條約的利益呢，還是德國的目的在於建立一種獨裁式的「保護」而把各國退為半主權國的地位？

直到一九三三年夏季的末尾，德國領袖們的對外政策總路線還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明白。對外政策的方向似乎並沒有任何決定。納粹政權最初所採用的，不過只是些並無雄志遠圖的日常政策，目的只在求得重整軍備，擺脫條約的束縛和阻止任何反德的重要聯盟而已。領袖所追逐的，只是些戰術目標。德波協定就是其中之一。

但在一九三三年秋季，我們難道還不能在第三帝國的對外政策中看出有清算「歐洲政治懸案」的決心嗎？宣傳部長哥培爾在日內瓦講我到他的旅館裏去見他，討論使德波關係緊張的可能性；我乘機向他提出「歐洲總清算」路線。貝克上校慎重地對德國代表團表示友誼的慰勸，想藉此促進德波締結協定的可能性。我請他吃茶點；他來了，接着

他就和哥培爾去參加一次相當引人注意的會議。曾被幾家外國報紙稱讚爲一個具有「拉丁心靈」的哥培爾，在國聯大會中座的第一排上坐了一會兒，他那纖細的身影正巧和他的隣座紐拉特先生成一個對照。哥培爾是到那裏去充希特勒的耳目的。那時，各國的意見大多仍認爲國社主義的活動不過是青年血氣方剛的粗野放肆而已。大會主席斯穆德將軍（General Smuts）對某些國家用來掩飾自己的新國民訓練頗爲讚賞。哥培爾曾在一次午餐席上借力翻譯官和保羅·彭考（Paul-Bancour）作一次長談，向他說明德國政府的和平的社會目標和政治目標。他也曾在報紙上發表言論——一篇引起很大的興趣但完全使人失望的談話。

我把我對於德波可能締結條約的意見告訴哥培爾，並繼續說到和平解決東歐問題的方法，但是他完全不同意我的意見。我指出波蘭可以在德國對外政策的大計劃中充作一個有效的鑰匙；哥培爾帶着他那特有的傲慢態度和聰明的氣氛向我滔滔而談——他說，德國所要的聯盟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以漸進的方法脫離凡爾賽條約的束縛是不可能的；他繼續談下去傾吐出對國聯大會的蔑視。他談到那整個機構的「空洞」，懦弱和無效；

他說，它只會使我們走得離它更遠，老實說，它只會召來強硬的措置。這些傢伙只能用殘忍的手段才能把他們壓服：因為他們貧血貧得太利害，自己決不能使用殘忍的手段。

過後不久，德國不但退出了軍縮會議，並且也退出了國聯。日內瓦的德國代表團狼狽非凡。捲起行李，溜之大吉。這是在對外政策上以國社主義姿態出現的第一件重要事情。這個步驟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幕後會有過劇烈的爭辯。代表團在羣情激奮之中，會對退出國聯的決議發出一個強硬的復呈，但又遭駁回。日內瓦的德國代表團——我和他們頗為熟悉——鬧得智窮才盡。這是動力主義侵入一個以烏有的保證維持的世界之第一步。

但難道每一個合法狀態，每一個條約關係都是一種烏有的保證嗎？德國退出國聯並不是國社主義對外政策踏上革命路線的第一步，德國早就決定了這幕戲的劇情，她早就決定要做驚人的舉動。退出國聯澈頭澈尾表現了國社主義領袖的特性。這個舉動和這個舉動的態度，不但對凡爾賽條約的一個正面攻擊，並且也是對合法原則和條約信仰的一

個正面攻擊。

國社主義和西歐的政治觀念斷然決絕以後，最自然的舉動，當然是莫過於另外去創造一個盟約制度，作爲一個積極的建設以與日內瓦的「烏有」制度相對抗了。德國代表團離開以後，我因但澤事件仍留日內瓦，因此有機會觀察了一下德國這個舉動所引起的國際反響。國際的心理反響在我看來似乎是這樣的咄咄逼人，我覺得德國在拒絕國聯那些缺乏效率的原則以後，應該以合法狀態的不可破壞性爲基礎，宣佈她願遵守條約狀態的明確態度。這麼一來，她顯然就可以把大不列顛和法國隔離開來。當某些國家正在準備戰爭，在轉念頭如何阻止德國侵略的時候，德國爲審慎起見，尤其應該消除爲領土作戰的理由，她應該以疆界的不可破壞性爲基礎，和隣近各國訂立條約，用那些條約來消滅疆界問題。

我從日內瓦回到柏林，便乘機向希特勒指出德國退出國聯後，但澤所發生的不穩形勢，並且力勸對黨員實施最嚴厲的紀律，因爲只有避免意外事件，才能使我們脫出那現在已經陷入的危險地帶。我發覺希特勒極其樂觀，雖然那時德國的形勢似乎沒有什麼可

高興的地方。在這種情緒裏，希特勒並沒有和我作劇烈的爭辯。我們的密談繼續了一個多鐘頭，可是在這個時間內，我只能插一兩句嘴，訴說一下我的焦慮而已。我反對唐突地退出國聯，這似乎在冒着不必要的危險暴露德國的軍備和民族政策；希特勒的答辭很長，他說，德國需要一個解放行動，使德國一舉而恢復行動的自由。德國所需要的不是那種似乎合於邏輯的小心考慮，而是一個大快人心的舉動，直捷了當地對那些慣於撒謊的陰謀家回答一聲「不」，以一個簇新的出發點來證明果斷的決心。不論這種行動是不聰明，但日耳曼民族只懂得這種行動，不要什麼斤斤計較的討價還價。日耳曼民族已被人牽着鼻子走得夠了。他往下談到「自由主義的毒藥」。那些衰老的民主國家，或許因為多少已經服慣了它，所以還能夠受得住。但德國却是一個年青純潔的民族，這種毒藥對她是致命的。這像梅毒一樣，當那種疾病剛「從美洲」傳到歐洲來的時候，一染到它，幾乎總是送命的。但是——他說——久而久之，幾代以後，身體就可以得到免毒素；那種疾病就會變成無害的了。要是我們不把這些有毒而危險的社會消滅，至少也必需使日耳曼民族和它們斷絕來往。他接着又說到「建築物的崩潰」這個題目，這是地理

政治的比喻，意思就是指歐洲社會制度的崩潰，他用這個比喻說明德國需要在極端活躍的環境裏找到一個孤立的平靜地帶。

我發覺他故意在避免實事求是地討論面對着我們的危機和處理這些危機的步驟，我恭聽了一曲興奮的獨唱。我所探詢的問題只被偶而提及，但即使在提及的時候，也只說到一些閃閃話，很少吐露一點實際的意向，這種談話方式在我的確是一種新經驗。這是一種審慎地培養出來的技術，後來我發覺其他偉人也都採用。這種談話方法可以避免對一個問題作任何理性的考慮，使拜訪者處於附屬的地位，只能靜坐恭聽而很少有機會作任何有力的辨論。一篇聚精會神的演辭結果，只說出了一個已經確定的意見，拜訪者冒險提出來的微弱的反對，就高傲地被攆斥為只完全是些皮毛。這種技術最少可以使聽者感到他人品的優越。

在一九三三年秋季，但澤的形勢特別不安。由於挺進隊的不法行動，意外事件層出不窮，挺進隊要求給予合法地位，使它可以隨時干涉波蘭軍隊。大家都知道，那時波蘭已有一種計劃，準備以五個階段恢復自由市的合憲狀況，以她那時的地位來說，她覺得

什麼時候合適，就可以在什麼時候實行。那時德國的兵力尚不足阻止波蘭這種行動，也不能冒險與波蘭引起武裝衝突；我曾和有關的德國軍事權威商討過這個問題，他認為我的意見完全正確。德國退出國聯後，情勢毫無改進。德國是在追逐一個非常危險的路線。在這種情勢裏，希特勒的自信精神並不是什麼莊嚴的決心和信仰的結果，他不過是在孤注一擲，以民族的前途作莫須有的冒險吧了。他的成功並不能平息責難。德國的敵手為什麼不出來干涉，她們為什麼勸導波蘭不要以任何暴力行動顛覆凡爾賽和約制度，那些理由現在是路人皆知的了。理由之一，就是她們對國社主義作了一個錯誤的估計。那時，他們看不透在民族主義偽裝下的國社主義真是一個毫無方向的革命。德國國內的資產階級朋友也抱着同樣的希望。在這次謁見裏，希特勒對謹慎用事的主張的極端蔑視，使我懷疑德國退出國聯，並不是一個以獲得自由行動為目標的聰明的政治行動，並不能得到革命的動力主義的結果，並不能一舉而使德國脫離現存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

在決定命運的那一天早晨，我在日內瓦遇到一個和希特勒私交頗密的美國新聞記者

W先生。那時，各方正謠傳德國將脫離軍縮會議。W先生宣稱希特勒如用普通手段，就可以獲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而且絕對可以獲得。踏上革命路線會鑄成大錯，會不可避免。地走到那第一個德意志帝國主義所送命的地方。退出國聯這一個唐突的步驟，惟一的目的，即在把日耳曼民族驅上革命路線。國社主義的大危機，在于民族主義野心的早熟。那會使國社主義成爲一個冗瘤。日耳曼民族的領袖們爲了維持他們本身的權力，不得不把民族駛入一個難於捉摸的革命浪潮之中。

我謁見希特勒以後，我愈想愈明白，知道這就是德國退出國聯的解釋。那天下午，我又有機會參加在上議院舉行的「領袖會議。」我發覺領袖已注意到我的復呈，這使我覺得很滿意；他着重地提出，對一切黨的組織必須實施絕對的紀律；絕對的矯正，使西歐列強沒有侵略的藉口。她宣稱，要是有人竟敢抗命，以德國的軍備作冒險，不論他是誰，他都要把他槍斃。他說，德國決不該再回到那腐朽昏庸的民主國家隊伍裏去，她們是命定了要死亡和毀滅的。德國已永遠與世隔絕了。幾年以後在公開演講時所發表的議論，在這次會議裏說得很詳細——德國在準備一個驚人的革命；在這個鬥爭裏，一切事

情都是可能達到的；日耳曼民族必須準備百折不撓地奮鬥；德國所需要的，不是「合理的」行動而是一種使整個民族毫不猶豫地服從的行動；德國所需要的，不是合理的行動而是一致的行動。德國要把那虛偽、欺詐、罪孽深重的制度的全部條約撕成粉碎。全世界將來都不得不來追隨德國。

希特勒在那天早晨曾告訴我他對條約價值的看法。他說，他可以簽訂任何條約。他可以對任何疆界加以保證，可以與任何國家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誰要是以為這種計策沒有什麼用處，因為將來總有一天得破壞一些形式上的協定，這是一個傻瓜的念頭。一切發過誓言的條約，遲早總是要過時或毀壞的。不論它是什麼條約，不論是處在怎樣的形勢之中，誰要是去大搖大擺地捫心自問，問他是否應該保持一個條約，他就是一個傻瓜。要是旁人覺得簽訂條約以後就安定了某些問題，我們又為什麼不這樣做而使他們歡喜和使自己的形勢鬆弛呢？他可以出乎至誠地締結任何協定，但可以無動於中地在第二天就把它破壞，要是這對於德國的前途是有利的話。

說到這個題目，領袖就提到在五月裏和波蘭訂立的互不侵犯協定。他說，他訂立這

備協定，並不足使人大驚小怪，因為那時這是一個有用的步驟。我乖機又兜回到維持德波和陸關係這個題目。我看重地指出阻止形成任何威脅德國的包圍的重要。在我看來，那時如要辦到這一着，就必須和波蘭保持良好的關係。這些議論對領袖所生的印像，比在日內瓦對宣傳部長所生的印像要深一點。希特勒似乎對畢蘇斯基上將有相當的尊重。他又重述那早就已經對我談起的願望，希望能和畢蘇斯基上將作一次私人談話。至於那些西歐政治家，他對他們的古板，虛偽、懦弱、猶豫、有說不定的蔑視。

波 蘭

國社主義者對付波蘭，用的是一種隨機應變的政策。它能採取這樣的一條路線，頗堪注意。黨的領袖們有意越出了他們的既定路線。德波互不侵犯協定是和納粹德國的任何對外政策都完全矛盾的。但雖然在對外政策上有了這非常重要的初步開展，國社主義却並沒有做到它可以做到的任務，並沒有在某些重要的事件上與波蘭成立堅決的合作，

疆界問題其實只是德波間的次要爭執。

早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在我代表政府訪問華沙以後，領袖就訓令我傳達他和畢蘇斯基會面的願望。這個秘密使命當然不是我職務範圍以內的事情，但它却使我可以向上將作一次非官方的拜訪。我會努力想把這步拜訪排在但澤和波蘭的初次協定訂立以後，使和但澤事件在一起，以便協助懸案談判的進行。但是，雖然作了種種官方和非官方的建議，差不多過了四個月，拜訪畢蘇斯基才有了技術上的可能性。但正在那時候，就發生了戲劇式的德國退出國聯，局勢頓趨緊張，波蘭當局頗思採取反德行動，訪問又不得不延期。到十二月初頭，局勢才漸漸澄清，足能舉行訪問了。

畢蘇斯基上將的身上，那時已刻劃着不治之症的痕跡，他給我一個澈底討論的機會。他的談話大部份涉及那作為日耳曼民族新政體的國社主義；他談話異常懇切。據我看來，他似乎在嚴肅地考慮和德國成立密切關係的問題，但還沒有決定，他顯然也抱着許多波蘭關員向我表示的那種疑慮：究竟德國真正的目標和企圖是什麼？他直捷了當地引證納粹政權某些特別顯著的現象，由於那些現象，他對德國國內情況的安全表示懷

疑；這就是說，要是德國的情況真正安定，他願意盡力解決德波爭執，他之所以猶豫不決，完全是由於對國社主義獨裁制度的性質表示懷疑的緣故。上將反覆地說，希特勒先生冒險冒得太多了。他並沒有改變日耳曼民族，以他現在所採取的手段，他是不會使它改變的。他似乎是在改變它，但所有的困難依舊存在；它們不過是被驅逐到表底下去了吧了。在適當的時機，它們又會出現的。

上將述及他自己訓練波蘭民族的困難。他曾努力了好幾年，但他並不能說現在已經成功。他的力量是太弱了。他又說，他十分清楚國社黨在德國國內所幹的事情。他往下說到希特勒的一個基本錯誤：他走得太前面了，而結果全部責任都要由他自己負擔。畢蘇斯基自己只有一次越出了他想保持的隱匿地位，自那次以後，他的地位就比他希望保持的公開得多了。「隱匿揭露了大師」，他一次又一次地吟誦哥德的詩句，並且宣稱只有中庸之道才能建立萬世之基業。訓練人民當然需要一個大師。他想起亞歷山大和布西潑溜斯的故事，並且說，一匹名駒願意戴一個優良的騎師，但却會把拙劣的騎師摔下來。無疑地，上將的意思並不就是說他認為國社黨的領袖是一個拙劣的騎師，而是

用來引證德國的革命運動把獨裁手段用得太過份。他從一個不自然和過分誇大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有時或許不無用處——裏看到了納粹政權真正的弱點。他引證他自己的錯誤來緩和他的批評。但是他所引證的一九二六年的行動，正說明了他會極小心地避免希特勒所過分沉溺的路綫——瀟頭澈尾的獨裁制度。畢蘇斯基認為這是有害和不安全的，因為它將摧毀一切新生的元素。最後，上將找到了拒絕和領袖會面的藉口。希特勒的意思是，在邊疆火車裏會面；畢蘇斯基以為這會發生「技術上的困難」。

一個敵手的言論或許可以使你學到一些東西；我覺得我無論如何應該對希特勒傳達這次談話的批評。他的回答頗足表現他的特性。他顯然故意在欺騙他自己，他引證東普魯士事件。那時東普魯士正在進行一場與高采烈的內戰，各黨各派都捲入在裏面。因此希特勒說，畢蘇斯基不過是受了東普魯士的暫時不安的影響而已。他把一切嚴重的反對^在揮在一邊，拒絕加以考慮，以免召麻煩。我曾在其他的場合聽說過，領袖是拒絕聽取人家的批評的。因此我敢假定我的經驗並不是沒有人享受過的。在希特勒的天性裏，這種羅曼蒂克的特性，這種「不要擾亂我的良知」的呼聲，這種以自擬的假定當作確定的事

實的決心，常常被那些鑽求爵位和阿諛讒媚的傢伙利用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我的報告完畢以後，希特勒突然問我，要是他在西方有所舉動，波蘭是否會保守中立。我承認這正是我所焦慮的問題，但在這德波關係依然曖昧不明的時候，這樣的一個問題完全是多餘的。唯一的實際問題是怎樣和波蘭建立條約關係，怎樣能使波蘭掩護德國的後方。我乘機向他陳述我對於更進一步促進德波正常狀態的看法，我主張在一場暗鬥以後，德國應該和波蘭締結一個積極性的條約。我所得到的回答是：「當然，我很高興放棄過去的反波態度而能和波蘭一同進行我的東進政策。」那句話截斷了我繼續討論的機會，我本來是想說明德波同盟政策的，這個同盟在那時和以後都很有成立的可能。波蘭極想實行這樣的一個政策，只要她的夥伴不太急於要去採摘那相當時期以後才能成熟的果子就得了。一九三三年七月，在我第一次官方訪問華沙的時候，波蘭當局曾請我用我的勢力阻止公開討論如「盧森堡在烏克蘭」那樣愚蠢的計劃。那決不單是盧森堡的事。還有，洩瀆以立陶宛「交換」波蘭走廊的計劃，也是一件最不智的事，或許德波疆界爭執在以後可以找到一個解決；但這個問題現在還談不到。德國如採取一個和平的修改政

策，她自然會加重她的影響，德國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經濟合作和政治合作，疆界問題即使有討論的必要，也得在最後才提出來。

反過來說，要是疆界問題的遷延，只是政治形勢不穩的一個僞裝，並且在那種基礎上大肆宣傳，那末，德國就決不能守住互不侵犯協定的精神，決不能建立真正差強人意的關係。國社主義在這兒又拋開了它的機會。在它的宣傳工作裏，非但從不隱秘它修改疆界的目標，並且從不費一點力量爲這個目標造一個動聽的理由。

波蘭準備和德國調整關係的動機是和德國一樣的，就是懼怕孤立。在波蘭那方面，或許還含有對西歐列強的遲鈍和不理解表示失望的成份在內。她的新政策的初步舉動，便着重地表示，即使沒有西歐列強的照顧，她自己也能幹一番事業，並且，要是國聯和西歐列強對她最迫切的需要不予幫助，任憑她處在困難的環境中，她也能一反過去的方向，踏上她自己的道路。德國不應該因爲不能對波蘭抱過分的期望就因此不與波蘭成立諒解。她可以把明確的經濟利益和物質物益給波蘭，促進波蘭和西歐列強的分離。波蘭沒有殖民地可以割讓，並且缺少重要的原料品，她對德國並不像西南歐那麼重要；但是

她的政治比重是非常巨大的。和波蘭成立真正的政治諒解可以在所謂「中間歐洲」——德蘇之間那些區域——收到非常重要的效果。要做到這一步，第一個條件是放棄執行支配權的任何要求，並且明白地顯示消除雙方憂慮的準備，包括邊疆問題在內。

改善德波關係可以產生一個非常有用的「軸心」，它可以形成一個西南歐的核心，一個大「聯邦」會在這個核心週圍結晶起來。這是一個合於波蘭理想的聯邦，可以與蘇維埃聯邦對峙。當然囉，波蘭想和德國締結協定的動機並不是這些觀念，而是想把德國的壓力轉移到西歐和東南歐去。因為德國佔領東南歐以後，西北歐方面的壓力實際上將大見減輕。

德波關係的基本要素，是新德意志帝國所接收過來的舊普魯士野心與波蘭野心間的敵視；兩者都要求那同一的領土。兩者都不是民族主義的野心。惟一的解決方法，是建立一個超民族界限的國家或聯邦。並且兩國共同合作「保護」——用霍斯浩爾的話——這些領土。他并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德國並沒有真正估計出波蘭的重要性。德國要在東歐重新樹立舊日耳曼聯邦的權威和擴展它的影響，必須得到波蘭的友誼，方可阻止在蘇

德之間形成一個人口等於德國或超過德國的斯拉夫集團。

對波政策被認為是希特勒的一件傑作，沒有別的政治觀念比這個政策更能揭露國社主義的本質，對波政策以做到一步是一步為原則，最後的成就或許正與最初的希望適得其反。我們可以確定波蘭是在避免與德國採取共同政策的傾向，並且是謹慎地，但執拗地在追逐她自己的計劃，以圖在「中間」歐洲，在德蘇之間成立一個獨立的機構，逐步的將德國從東歐排斥出去。德國去年夏天（譯者按：指一九三八）與西歐列強起政治衝突的時候，甚至連波蘭的中立保證都得不到。要是德國早就坦白地宣佈放棄修改疆界的企圖，在過去幾年中，她一定可以得到更大的政治勢力。我在當但澤主席的時候，時時在口頭上或文字上發表「疆界消毒化」的觀念。有一次，我抓住一個機會，向德意志帝國銀行總裁沙赫特博士提出我那對東歐，尤其是對波蘭實行一個建設性的政策的意見，因為那時他還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人。還有一次，我到愛森去演講，聽衆是經特別邀請的，我努力指出和波蘭訂立經濟協定的必要，並且提出一個非常寬大的計劃。在這種場合，我常常自己問自己，我是否需要隱匿那普魯士已經追逐了一世紀半的政策。回答

總是談談「普魯士」政策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沙赫特明白地表示，他的興趣主要的是在東南歐；但他也準備對波蘭工業界貸出長期信用，藉此加緊德波經濟關係。這個政策需要有溫和而耐心的處理；但我不久就明白這是行不通的，因為國社主義要立刻得到報酬而不能等待。

那末，德國在東歐的真正目標是什麼呢？誰都不知道！希特勒并不希望成立任何明確的計劃。對波政策依舊是一個隨機應變的政策，它抓住每一個機會，能得到什麼就得到什麼。從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出，希特勒的政策實際上是要比外界所想像的簡單得多。它的目的是在爭取時間，什麼都沒有，用貝克上校的話來說，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些喜歡用現實主義這個名詞的人，稱這也是現實主義，但稱它為「機會主義」或許比較更正確些，這是一種利用每一個到來的機會作革命的發展的政策。這說明國社主義是多麼的毒辣，它只能破壞，不能建設。

但要是說德國的政策不明確，難道波蘭的政策是明確的嗎？現在我們都知道波蘭也是在爭取時間。許多人都以為國社主義運動會自己消滅，德國現在雖然不斷的勝利，總

有一天它的錯誤會大白於天下，各國會聯合起來反對她，解決各種懸案，使她無利可得。因此，爭取時間無論如何是一個有用的手段。

國社主義對波實際政策的企圖是失敗了，至少是沒有什麼進展。但澤政策也失敗了，革命的極端性不允許有限制，德國甚至攻擊到對方的政治領袖，德波關係因此一天比一天僵化。在但澤事件上，只有把特殊政治問題寬大為懷地解決，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要是國社主義不把國內外的破壞革命看得比遠大計劃的利益更重，這樣一個解決對它是一無所損的。

遲 遲 的 不 安

東歐的政治計劃依舊在猶豫未決；德波關係依舊還沒有成熟。由於瘋狂的反蘇宣傳戰的發展，任何德蘇同盟暫時都無法談起。至於德意關係，雖然說在兩個獨裁制度之間至少應該有同情的存在，而德却只能痛苦地和她保持妥協狀態。在我的奮鬥中所描寫的

英德友好關係的遠景，現在是愈來愈遙遠了。西南的道路似乎被奧大利封鎖着。那末，革命將採取那一個方向唐突地闖入日內瓦呢？

它每一個方向都採取，它建立了無數的據點。新的據點不斷地成立。革命一直向權勢的中心前進，在它看來，沒有一個地方是太遙遠的。否認日內瓦的法律基礎和條約基礎，並不是任何大政治計劃的前奏曲而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宣傳前奏曲。退出國聯是一個小心地安排好的步驟；它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爲各國看不清國社主義的廬山真面目。當她們看清它真正的企圖的時候，已來不及進行有效的反措置了。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的歷程，不過是幾年前國內政治的一個個重復——一個遲緩，毫無收穫，不被人注意的發展，到有利的政治形勢出現的時候，幾年來的精力才突然結成事實。國社主義的戰略原則是；只有對革命形勢成熟的地方，才進行突擊，但要革命形勢在外國成熟，並不僅僅是等待能夠得到的，而須要千方百計地去促進它才成。德國在平時就應該進行類乎戰時的行動，應該在一切有關係的國家裏建立革命的據點。但一切國家都是有關係的。從促進動力革命的觀點上看，沒有一個國家不是一個重要的戰場，不論是勃蘭齊爾或太平

洋上的島嶼，不論是中國或美國。寫到這裏，我想起了希特勒對他的友人所表示的「擴大戰略」，它武裝了國社主義，在世界清平的時候，它就決定了戰爭的發生，因此國社主義可以得到他人從未夢想過的大規模的勝利。

更沒有比德國打遍全世界這種觀念更足以說明國社主義的特質，更沒有比在國社黨海外部部长波爾先生的領導之下，派遣使徒到各國去這件事情，更明白地揭露了國社主義的革命性。稱霸世界並不是僅僅靠機會可以達到的，也不僅僅是利用青年人的熱情就能成功的——雖然國社主義的領袖們總不放棄利用野心和私人仇恨的機會。它是有組織的，有無窮的力的來源。它利用中產階級的特性，組成了一個廣大的國際宣傳網和革命組織網。

這個普及全世界的準備工作，無疑地是國社主義的一個戰術成就。但真正的成功還沒有到來。國社黨員潛入了西班牙和勃拉齊爾，潛入了遠東和非洲，潛入了小亞細亞和美國，當然，也潛入了所有的歐洲國家，由此可以看出組織網工作的擴展了。

在這個據點政策的背後，潛藏着在世界各地促進革命的動力主義的大計劃。這就是

國社主義在對外政策上的實際計劃——引起普遍的政治不安。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是軍事目標或戰略目標，如西班牙或斯坎的那維亞。但每一個地方最後都足以影響到軍事形勢。而只有憑着它那水銀瀉地般的手段，並且干涉世界上每一個問題，國社主義才能達到它的目標，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勢。

國社主義的民族主義夥伴和德國官方的外交家，最初一定不能明瞭這個計劃。海外部部長波爾之入外交部，證明是職業外交家以「動力」姿態進行對外政策的一個決定的勝利。在國社主義的領袖當中，有些人對這個政策抱着懷疑的態度；羅森培便是其中之一，而當然也是爲了這個原因，他才得到下野的結果。無情的動力主義戰勝了一切其它的政治計劃，政治目標和政治手段，這是德國革命的無原則性的自然結果。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的內容，只是引起普遍的不安而已；這是一個自私自利的革命。這個特性戰勝了其它一切，戰勝了把革命納入正軌和向固定的目的地前進的意見。因此，所有那些日常措置，軸心，友誼，條約，甚至敵意等等，都只有戰術的重要性，那些不夠革命，不夠機動地看出權威是革命運動的目標，而普遍的不安是它的手段的人員，黨就把他們推下

下政治舞台。

說到這裏，我想起一九三三年夏天在希特勒的茶會上討論以創造不安作革命運動的武器的那一場談話來了；那天希特勒本人並沒有在場。在場的計有威廉親王，希特勒的朋友攝影家霍夫曼（Hofmann），希特勒的機關報秘書漢夫斯丹格（Hantstangel），青年領袖叔拉克（Schirach），哥培爾和其他著名人物。談話是從烏克蘭開始的；他們以為挑起烏克蘭內部的不安，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干涉的機會。我好像還記得曾討論到退職的哥薩克上將斯科羅伯斯基，某些政治圈中的人物把他隱匿在德國，以備在緊急之秋可以利用，但國社黨黨員對這件事並不完全贊同。有一個人說，德國應該在每一個國家挑起極大的內部罅隙，以便很容易地把她打倒。關於這句話，也有人提出反對，但大家都同意這完全是一個錢和組織的問題。東歐和西歐的區別，只是在西歐要多化些錢而已。民主國家沒有一種信念，一種真正的信念可以使人民為國捨身。沒有信念的人民總是失敗主義者；他們以為抵抗是沒有用的。德國要在任何國家推動任何特別運動，人手總是不愁找不到的，各階層和各種教育程度的人都很豐富，你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在

這方面所化的錢，真可謂一文不落虛空地。它可以使你在將來少派幾個軍團出去。

有一個人說，民主國家毫無辦法抵擋這種攻擊。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阻止這種攻擊的方法只有把國家專制化。獨裁制度對這些武器有很堅固的壁壘防護着。她們在道義上的地位比較堅強，可以藉此補足軍備的劣勢。有人反對說，這個政治策略的效用很有限，因為對非民主國家，無法去挑起罅隙，而德國將來或許會和非民主國家發生非常嚴重的衝突。這個考慮所得到的回答，很可以表示國社主義的特性：「我們的敵人永遠是民主國家，而且只是民主國家。理由很簡單，因為她們已經衰老了。我們必須老是在去找尋比我們弱的敵手，而和那些危險份子做朋友。」這聽來好像是一個廉價的笑話。但說這話的人却完全出於至誠，他就是坐在我旁邊的漢夫斯丹格。直到後來，我才發覺他不過是想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形式說出領袖的意見而已。關於動力政治運動的本質，我從未聽到過這樣坦白的自認。

在德國外交部長波爾先生的指揮之下，僑居外國的德國人就成了這種活動的中介物。他們被迫走上一條高度革命性的新道路，被迫作種種政治活動，在客居的國家裏充

作「動力主義」的担擋者和革命準備的據點。幾世紀來，大批的日耳曼殖民流入了東歐和東南歐其它民族的領土。這些德僑顯然已受過訓練，並且已時時被利用。國社主義政權企圖利用他們來擴大黨的影響，使黨在德意志帝國國內對國家和社會所完成的工作擴大到國外。他們得成爲國社主義的國外經紀人，他們對那些和他們一起生活的人，上至政治態度，下至私生活的一舉一動，都要小心留意，企圖加以訓練和影響。他們得成爲國社主義哲學家無止境的「訓練」的宣傳者。慕尼黑協定以後的捷克事件之發展已暴露了國社主義準備了多年的宣傳工作和爲企圖達到日耳曼民族主宰世界所成立的組織。

某些政治家深信德國歷史中的國社主義階段終了以後，日耳曼民族和僑居外國的日耳曼人依舊得作生存鬥爭。在他們看來，這個利用日耳曼僑民——不論他們依舊是日耳曼血統或變成了外族——的破壞政策，實在非常可慮。德國值得追求的，惟有同盟政策，而僑居外國的日耳曼人，尤其是在東南歐和近東的日耳曼人，乃是同盟政策的一個重要資產；爲了這個理由，他們應該不參與政治干涉，並且應該擺脫日耳曼民族的一

切浮妄氣概。

說普遍的不安計劃是國社主義的政治戰術，同時又是它的政治目標，這句話或許並無偏私。手段和目的這兒已混而爲一。這是國社主義革命的「動力主義」的無原則性和無方向性的一個特質表現。上文已經說過，羅森培是反對這個計劃的，他在對外政策上有明確的目標和固定的計劃。他之被逐出實際政治舞台實爲理所當然：他不是一個實幹的人，不是一個組織者，但他的政治觀念是有邏輯系統的。他的世界觀是整個的。他對於那些在青年時代崇拜 H. S. 張伯倫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的人，有決定的影響。不論他的觀念是否有價值，但至少並不互相矛盾。可是不矛盾並不有利於「動力主義」呀。

正像他離開革命運動的第一個經濟「專家」一樣，希特勒顯然也已離開了羅森培。國社主義之急進爲動力主義，好像是沙樂美的跳舞：意識形態的面具換了一個又一個。羅森培的對外政策在今日的旋律中，是太呆板，太拘泥了。希特勒今日的政策旨在挑起普遍的不安。國社主義政權的實際目標並不固定。這種無原則性使他能迅速地抓住每一

個足以增加它權力的政治機會。

但是羅森培的意見依舊還很重要。在這本書裏，我雖不會直接引用過他的句子，但已好幾次把他的話用來說明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的趨勢。在某些時機，當希特勒覺得需要利用固定的政治目標的時候，依舊還得採用一下他的條頓大歐洲概念。「條頓大歐洲是將來唯一的解決方法，一個種族國家的日耳曼帝國處在歐洲中部，屏擋東歐和東南歐，作為歐洲大陸的中心強國；斯坎的那維亞諸國和芬蘭作為二等同盟國，屏擋東北歐，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利用大不列顛來屏擋西歐和海外，以保全條頓人種的利益」。這是羅森培在他所著的「二十世紀之謎」中發表的煌煌大計——「德英聯盟」和「德——斯坎的那維亞聯盟」。這兩個政治聯盟消極地可以用來對付俄國，「防止東方唯物主義的黃禍」，積極地可以使「一萬萬日耳曼人都有土地」。國社主義早期對外政策的特質就是：反蘇，條頓人種大聯盟，德英近親種族聯盟，以及那替東進政策打開一條自由大道的「東歐領土政策」。

這一切特質不成問題已成了國社主義的陳跡。在那些決定目前第三帝國的戰術的政

治家眼中，它是太缺乏野心，太不革命，太呆板，太注重禮義了。它是一個既定秩序的
政策，目標固定而明確。它是民族政策，種族政策而不是動力政策。它已經被革命的發
展迎頭趕上了。

一九三四年，我在羅比克的「條頓人大會」上，很幸運能和羅森培以及他的同僚有
密切的接觸。那幾場會議毫無足述之處。培養條頓——日耳曼文化的地方是作家旅館。
羅比克的市場上有過兩次公開演講，市政廳裏開過一次祕密會議，全部節目不過如此而
已。在這最後一次的會議裏，一位田園勞働者出身的鄙陋的領袖作了一次莫明其妙的演
講，另外一位代表則在一個帝國主義經濟的題目上反來覆去的講了又講，其他的發言人
也作了幾篇十分「可敬」的演講。這種澈頭澈尾的「可敬性」標明了羅森培的全部特質。我
記得有一個人還莊嚴地宣佈，說「秩序」是國家的基本觀念。在一陣古雅的音樂以後，
羅森培就在蠟燭光旁邊開始一篇詞藻優美的演講，論到條頓秩序在俄國的歷史和現代對
秩序一詞的觀念；所謂演講，其實不過是誦讀，風度頗像被人蔑視的前國社主義時代的
政治家。但環境非常藝術——瑪琳堡客廳拱門裏的搖曳的陰影，羅比克的午夜的音樂，

照得通光雪亮的教堂外部。一切都帶着十分可敬的十九世紀前期的藝術氣氛。

不，羅森培是不革命的，雖然他的文章裏帶着許多革命的情調，而那些研究它的人總不免對國社主義得到一個不正確的觀念。國社主義所傾向的急進的動力主義，是一股危險的破壞熱情，在莽撞地向四面八方散佈。而羅森培的國社主義，要是德國人在閱讀上沒有雜食的習慣，沒有讀過關於論及「制度」之流的書籍，它就決不會產生危險的影響，只是一種無傷於人的安樂椅上的冒險而已。

我所以提到這些事情，是爲了要說明國社主義的政策已急進得多了，信任國社主義的文字使徒將使你陷於錯誤。不論在對外政策或對內政策上，第三帝國已進入了虛無主義革命的第二個階段，「種族」因素大部份已被拋棄。國社主義目前的虛無主義對外政策，只把種種觀念作爲面具，實際上並無哲學基礎。

國社主義要把日耳曼民族統括在一個「大德意志」的疆界之內，它這種追逐「種族」政策的熱情，常常使人誤認爲就是動力對外政策的本質，但這個政策不過是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民族統一政治觀念的重覆而已。實際上，它是在利用衆所公認的政治動機

去達到其它的目的。只要對國社主義的實際過程一加以審查，就會證實這個論斷是不錯的。德國佔領奧大利，表面上是「完成」一個古色古香的民族烟思披里騰，然而佔領奧大利以後兇悍殘暴的行動已明白地揭露了國社主義單純的反歷史工作。德國對待被佔領的奧大利，正像任何軍事佔領者對待其佔領地一樣，毫不顧及奧大利的民族性，僅僅把她當作佔領國達到目的的一種工具而已。

蘇台德區的日耳曼人「重復併入」德意志帝國，其情形也是如此。也許有人可以對捷克斯拉夫族國的建立抱着很大的懷疑，也許有人可以因為看到捷克人和斯拉夫人的歷史分歧而對於一個「虛構」的捷克斯拉夫民族表示懷疑，但德國人決不能對之表示懷疑。「血統同，種族同，語言同，這種種政治因素，即使在具有幾世紀歷史的國家和其它歷史的民族聯合體中，也依舊有很大的重要性。」這種論調固然可以用來反對捷克斯拉夫民族的統一，但也可以用來反對我們德國人。捷克斯拉夫族國是凡爾賽條約所造成的，它包含着舊匈奧聯邦一切問題的雜形，但要是沒有萬不得已的理由，那末，國社主義的反捷克斯拉夫政策，只能說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很明顯的，德國想佔領整個捷克



斯拉夫；她的目標決不止僅僅在獲得幾百萬日耳曼人所居住的疆界，各國已漸漸看清，凡是僅僅有利於日耳曼政策的事情，德國却反而不得不阻止其發生。

凡是對國社主義所採取的手段下過一番觀察工夫的人，都不得不承認國社主義政權的實際理想是在於獲得支配權。所謂在德國領導之下，由條約關係維持各國領土完整的和平觀念，已被這些強暴手段證明是一個謊話了。國社主義的手段赤裸裸地揭示了它的真實傾向。這些手段決不能使各民族共存共榮，而只能產生一個統治被壓迫民族的支配政權。奧大利是德意志的姊妹民族，要是奧大利尚不能避免軍事佔領的命運，那末，斯拉夫人顯然更難於避免了。誰還能相信德國會有和平地建立中歐聯邦的企圖呢？

正由於這種考慮，一位奧大利朋友才在一九三四年春天要我利用我與領袖的關係和黨內諸公的關係，使德奧問題有一個和平的解決。他說，國社主義者在奧大利的鬥爭手段和反奧大利的鬥爭手段，只能摧毀日耳曼民族繼續它過去的歷史路線的可能性。德奧遲早總會合併的，但要是用武力併奧，德國就會喪失重整軍備和政治活動的効果。其它一切都可以忍受，即使兩個日耳曼國家遭受長期的隔離也不妨，但有一件事實無論如何

得避免——就是武力解決。那會摧毀日耳曼民族的前途，會使日耳曼民族不得不繼續那條暴力之路。而一個有思想的人都知道那條路會引你到什麼地方。

向我訴說這種焦慮的人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他準備使兩個國家追逐相同的對外政策，但誰也不要依賴誰。他指出德奧關係逐步地，但誠意地改進的機會。他着重地提出陶爾斐斯（Dollfus）關於德奧親善的意見。無疑的，他對緩和國社主義的可能性抱着很大的樂觀。他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在於德國國內沒有一個人能夠用這個企圖或任何同樣的企圖強迫黨的領袖們對德奧問題找尋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法。我已經引證過我自己勸導軍事領袖們推動這件工作的失敗經驗。在我有這個企圖的一年以前，希特勒不顧外交部的反對，而實行對一切訪問奧大利的德國入課以罰金五十鎊。那時，我很幸運能看到領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多麼情感，他對德奧發生爭吵的機會是多麼滿意，對用武力打擊奧大利是多麼歡喜。一九三八年奧大利事件和事件發生的途徑，等於國社主義政策宣佈自己的罪名，領袖們自己清楚地揭露了那到今天他們自己尚未坦白地承認的目的和手段。

在決不侵犯捷克斯拉夫的協定訂立以後的六個月，捷克斯拉夫這個國家終於被完全摧毀了，現在，我們不得不全盤承認，所謂民族間的血緣關係，所謂一個國家的過去歷史，或是其它一切，對歐洲疆界的修改都毫無重要性，重要的只是帝國主義對權力的追求而已。德國將來的政策永遠會與對付奧大利和捷克斯拉夫的同出一轍。

德國已把她整個政治路線的特質銘刻在這些行爲上了。她已聚起了大批的懷疑和仇恨，這些懷疑和仇恨倒並不是輕微不足道的，德國已把自己弄得大錯特錯，例如恢復主權那種要求，她在道義上本來不可否認是處於有利的地位，但現在也已經喪失了。在解決每一件懸案的時候，她已經把道義上的利益送給了她的對手，以致她們在「道義戰」中可以有驚人的議論來反對她，並且，在任何新的武裝衝突發生時，還可以藉此削弱她人民的團結。

慕尼黑協定訂立以前的種種發展，已顯出德國和這樣的一個衝突——和一個團結的世界聯軍對抗的衝突——是多麼的接近。佔領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以後的種種發展，更清楚地顯出這種傾向。要不是英國人願意和平，德國的形勢就會弄得非常絕望。要拯救

德國，只有在對外政策上起一個急劇的轉變。

論 辯

但德國是不是已準備好這樣一個轉變了呢？她是不是已準備在存亡危急之秋和蘇聯締結同盟以獲得一個依賴呢？國社主義的反蘇政策似乎是一個鐵的原則，第三帝國似乎無恢復舊德意志帝國統治者的親俄同盟計劃的可能。但是，我常常向人指明，事情並不如此。那現在正在進行的新三十年戰爭，撇開它那假定的意識形態性不講，或許就會變成一個決定永久疆界的戰爭。德國遲早總會去和蘇聯聯盟。德國有許多政治家以為史太林主義和君主主義的青年俄國難民之間的關係，必然會使蘇聯向一個新沙皇主義發展，但事實上德國要求聯盟的，却不是那想像中的什麼法西斯蒂「青年俄羅斯」而是蘇維埃俄羅斯。

一九三七年春天，在蘇聯大肅軍以前，德國有幾家地方報紙為蘇聯的事情大吹特

吹，以爲在布爾希維克國家裏，已露出了民族主義的新發展，並且行將肅清猶太人和空想的革命家。報紙大載史太林反猶太主義的事件，並以此斷定蘇聯將有新沙皇主義和新民族主義出現。我不知道這一切是否是德國宣傳部長所放出來的一只紙鸞或是其它方面所下的一個賭注。但只要是一洞悉國社主義政權無所顧忌的權力政策的彈性的人，都無疑地會相信，宣傳部長或那密密地被套上了口罩的日耳曼民族的任何主人，如要把對外政策來一個向後轉，是毫無困難的。

親蘇政策在國社主義的領袖們之中，決不會行不通。除了羅森培以外，其他出色的黨員很少有願意以德波同盟代替德蘇同盟的。我會和格里高·施德拉薩（Gregor Strasser）的信徒高克（Kock），一個親蘇政策的熱心擁護者作過數次談話，討論那個政策的限度和可能性。實際上，國社黨從未和蘇聯斷絕過全部關係。在我看來，至少在經濟領域內，德蘇關係是不應該讓它完全斷絕的，並且我發覺希特勒完全對這件事表示同意。

布爾希維克的領袖們也爲德蘇聯合這個奇異的計劃辯護，在他們黨的討論會中，他

們論證說，要是資本主義和贖武主義的德國爲蘇聯建立必需的軍火工業，對無產階級是有益無損的。但直到一九三三年爲止，德國要是想和蘇聯成立以進攻爲目標的密切的同盟，則所付的代價，將是德國國內的「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我想希特勒對這回事大概認識得很清楚，並且他認爲那個革命的時機尙未成熟。不成問題的，重要的軍界人士對它並不表示畏縮，因爲許多青年民族主義者對那個遠景已不再覺得有什麼可驚之處了。

希特勒避免和蘇聯締結同盟顯然是由於另外一個想頭——要是國社主義的統治手段和布爾希維克的統治手段相等，那末，它們就無法表示比人家更爲優越了。德蘇同盟當然會使國社主義的統治變成布爾希維克的統治的危險。希特勒現在還沒有發現一個能和他的政治手段對抗的敵手，他個人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和蘇聯做朋友是和做仇敵一樣的危險；她是一個能避免國社主義的詭計的夥伴，而布爾喬亞的國家却不能。

軍人對德蘇同盟非常熱心，因爲那國同盟可以得到不可估計的利益，要是德蘇同盟成功，德國的後方就得到了掩護。他們主張德蘇同盟是爲的實際利益。但德意志帝國的

統治者却不願接受同盟的實際利益，免得德國在戰時有傳染到革命的危險。這正像目前西歐民主國家的情況一樣，他們極力避免和國社主義的德國形成意識形態的聯合，但同時又主張政治合作，因為這樣可以使國內在戰時避免革命的危險。

希特勒在最初不得不採用種種政治陰謀安置他的貨倉，他要求充分的權力安定內政，使他可以冒險向一條革命路線航行。現在，德國的國防經濟（整個國家的經濟制度都服從軍事的需要，國民經濟力求自足自給）已有相當成就，經濟制度和社會秩序大部份已和布爾希維克的制度相近——當然，有許多重要的例外。（譯者按：德國和蘇聯的經濟制度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帝國主義最後階段的經濟制度；後者是社會主義階段的經濟制度，兩者雖然都採用獨裁手段，但前者是希特勒個人的獨裁，目的在維持私有財產制度，是資本主義最後的掙扎。後者是整個無產階級的獨裁，目的在加速消滅私有財產制度，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在獨裁的形式之下更快地達到共產主義經濟。著者只看到兩個經濟制度的表面現象，他的判斷是錯誤的。）因此，和蘇聯締結同盟已沒有什麼困難了。那個同盟將是國社主義對外政策一個偉大的革命收穫，是國社主

義的主要領袖們早就想得到的。

但要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這樣一個存亡危急之秋和蘇聯成立這樣的一個同盟，那統統無異乎在宣佈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希特勒雖然在一九三四年就宣稱革命已經過去，可是終究還抱着相當的戒心。（凡是聽到過一九三四·六·三十事件的祕密解釋的人，都明白他確是如此）這個同盟或許會使內政和經濟情況發生困難，或許會使那維持國社主義權力的革命的發展遲緩下來。決定締結這個同盟的日期已經很近了，而且會比德國國內外懷疑的更快地一天天的接近。由於軍事專家的贊助，這個決定並不會怎麼困難。

德蘇同盟就好像兩條河流匯合在一處，奔入同一的大海——世界革命的大海。它不是兩大強國爲了正常的實際目標而成立的普通聯盟。德國和蘇聯，要是他們聯合起來的話，將使世界立刻爲之改觀。那個同盟是希特勒未來的一大傑作。

德蘇同盟政策並不就等於宣佈國社主義過去東進政策的壽終正寢。這不過是像我的奮鬥裏所說的一樣，爲了那個政策本身的利益而不再進行那個政策吧了。這是那簡單明瞭的世界政策——爭取原料品政策——的一個手段。好一個東進政策！瑪琳堡呀，騎士式的命令呀，驅着牛車的農民呀，在異教徒中間不斷的斬殺，冒險和旅行呀，在這種種羅曼蒂克的想像後面，却隱藏着一個非常真實的需要，就是給日耳曼民族尚未解決的糧食問題找一條出路。糧食供給如不足，政治就不能自由，權力的根源就要消滅，民族的生存就永遠被籠罩着一層陰影。

對國社主義下批評常常是很容易的，因爲批評只及於意識形態的表面，而對於那些或許值得再三考慮的根本動機却可以不去注意。無疑的，在國社主義政策主要的短距離目標下面，正潛伏着一個軍事的，戰略的，或有關民族根本安全的主要問題。當這個問題被軍政長官用純科學方法提出來的時候，我們就不難看到，國社主義短距離的實際政策，是不能脫離那些正在追逐中的基本路線的。手段或許可以不一樣，但實際目標却不能有差異。魯登道夫在上次大戰中就認爲穀物路線是非常重要的，他甚至調整了他的戰略

計劃去適應它。在羅馬尼亞宣戰以後，德國就因食糧關係而佔領了瓦拉西亞。「煤油路線」也是如此。魯登道夫說，爲了煤油的緣故，他才在最後佔領大高加索。原料路線決定了國社主義的短距離目標和某些長距離目標。這是上次大戰的一個教訓。國社主義不得不走這些路線，因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必定要遵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才能得到勝利的保證。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軍事計劃決定了國社主義的政策。穀物路線，煤油路線和礦砂來源決定了德國的短距離對外政策，而戰略據點路線決定了某些和國社主義的既定路線正巧背道而馳的政策。

短距離目標和長距離目標

霍斯浩佛說：「被禁錮和遭了挫折的國家，依舊可以追求遠大的目標。她們當以百折不撓的精神追求最接近的目標，在這種追求中漸漸接近前者——愈接近則愈少談論它



們。」遠大的目標和最接近的目標之間的區別已漸漸在顯露出來了。少說話並不是國社主義者所愛好的習慣。但關於國社黨的最後目標却的確極少談起。這當然有許多動聽的理由。在那許多動聽的理由之中，有一種說法，就是大部份黨員和羣衆對於在勃拉齊爾或南非洲插足大爲費解，這不及發動一支膺懲遠征軍到東歐或東南歐那麼容易理解。遠大的目標非常不得民心，這可以從西班牙冒險事業中很清楚地看出來，雖然那在軍事上有極大的重要性，而一般民衆却對之頗表不滿。此外還有一個理由，一個非常簡單的理由：國社主義者不知道他們的最後目標是什麼。所謂普遍的政治不安，就是什麼地方發現有機會，就準備去干涉什麼地方，利用每一個機會來增加他們的權力。國社主義者實在只有一個長距離目標——干涉世界上每一個問題，隨時隨地要求權利均等。用商人的切口來說，實際目標主要的是保持靈活——神不知鬼不覺的換了一個題目。他們能適應當時的戰術條件。他們一會兒競爭殖民地，一會兒競爭那自夫路與到海參威一個偉大的大陸統治權，一會兒又要建立一個南美帝國或在南海稱雄。「總而言之」，霍斯浩佛隨薩爾之後警告國社主義者說，「決不要把所有爭取前途的計劃孤注一擲」。他認爲最高

國策的理想是在「發現大陸階段和海洋階段之間的正確關係。」不要過於注重陸上問題而忽略了「海洋地理政治」。

這個政策的特質是繼續作飄忽的活動，時時抓住機會幹一下。在各民族之間，不要他秩序，均勢和親善而要他根本不和。不論國社主義得到了多大的成功，不論旁的民族對它多麼讓步，新均勢是決不能得到的。國社主義主要的目標是在於準備，同時下定決心，要從中歐這個大陸囚牢裏脫穎而出：這是一個毫無顧忌，毫無原則的決心，只要能增加權力和統治權，它就什麼都要，什麼都幹。它要把世界秩序打得粉碎。機會雖不能使每一個冒險事業都成功，但至少總有幾個可以成功。國社主義站在祭台上宣稱，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代，是一個革命的轉變時代，在這大動亂之中，每一次堅決的衝擊都有成功的希望。這是一個成即爲王，敗即爲寇的綠林好漢和海上英雄的時代。

這種觀念很明白地揭露了國社主義「動力」政策的一個主要企圖，它不僅要使世界永遠處在危急和類似革命的狀態之中，並且要公開地製造不安。因爲只有在這種狀況之中，「青年」民族才有希望在太陽光下獲得一席之地。不列顛「僞君子」道貌岸然地斥責

德國爲掠奪者，但大不列顛帝國本身不就是用殘酷的武力和詭計造成的嗎？「生活就是掠奪」，國社主義者大聲附和海貝爾（Heibel），他們不懂爲什麼十六世紀直到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紀元所允許幹的事情，忽然又不許幹了。

國社主義對外政策的世界革命性，在它的長距離目標中才顯露了出來。在那些肚子吃得飽飽的民族的世界裏，這樣的一個目標是被認爲大逆不道的；海盜的手段和東印度公司的帝國主義手段已經變得比較文明，隱藏在辦公廳和賬房裏去了，可是許多人却以爲帝國主義的剝削手段，並沒有減輕其殘忍慘酷的程度。對一個幾世紀來潦倒失意的民族，我們必須考慮到它那整個錯綜複雜的情緒。要理解國社主義，我們就必須知道日耳曼民族統一的完成是延遲了多少時候，它所沉醉的帝國主義的冒險，有色人種的征服，權威的願望，是遭受了多少挫折；而西歐諸民族却早就在一個較少顧忌的時代得到滿足了。

受過高等教育的國社主義者，如奚斯週圍的人物，都有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他們以爲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出現一個日耳曼民族支配世界的時代，而最後則是一個英國

支配世界的時代。日耳曼民族愛冒險，具有青年人的決心和豐富的精神，極適宜於廣大的殖民地的爭取。它對德國有不可限量的重要性。活躍的日耳曼青年，正等待着去嘗試那殖民者的艱苦的，但變化多端而富於冒險的生活。

國社主義以這些青年的精力作後盾去追求那無限度的長距離目標。這個政策較其它一切政策都更急進，更革命，它的目標是這樣的曖昧，它處處都在留神向前推進和佔領陣地的機會，它要從老大帝國的斷垣殘瓦上建立起一個日耳曼帝國，像英法對西班牙帝國一樣。德國不斷的在加強國防經濟，發動全民動員，她正在秣馬厲兵，準備作一次殘酷的大戰。在新的戰爭中，攻擊的對象將不是歐洲強國而是世界帝國。勝利的大陸強國將把那些被消滅的帝國的統治權移到自已肩頭上來。

霍斯浩佛說：「不要因被禁錮在三塊小領土內而自怨命薄。只有在小領土上能安然相處的國家，才會永遠只是三塊小領土的主人。那些盼望着機會去實現「大領土長距離政策」的國家，一定會得到勝利。」「打破囚籠和小領土的束縛」。霍斯浩佛以為德意日三國共同有「一個最重要的長距離目標」。儘量召集種族同志和民族同志到他們的

旗幟底下，去爭取前途，去爲母國過於擁擠的人口爭取生存空間。

正像大不列顛只僅僅依附於歐洲一樣，地中海大生存空間（或在中央統制之下的廣大的領土）也只有一部份是屬於歐洲的。它將把地中海沿岸，非洲北部以及小亞細亞統一成一個整體，這個新整體並不比不列顛帝國更多帶一點歐洲的屬性。日耳曼大生存空間也只能循着同樣的路綫出現。它的根基是在中歐，或許也把北歐包括在內，總之，它的民族基礎和種族基礎的大小是不確定的，但它真正的生長發育却須在歐洲以外的其它大陸上。

國社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色彩

國社主義的最後目標就是最高權力和最高支配權。它的手段是顛覆世界，摧毀現存秩序，以便自由自在地去建立一個新的大支配權。在這種目標背後，潛伏着突破歐洲的企圖。我們當然無法用正確嚴密的條款來說明這個目標，因為它要受軍事政策和戰略政

策的影響，要受革命的破壞衝動的影響；但同時，也要受正義的要求——修正疆界和擴張民族生活——的影響。這個政策已非尋常的標準所能測度；過去的政治範疇對它已不再適用。想對那干涉世界上每一個問題的無理衝動作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一件徒勞無益的事情。

這個衝動的中心理想是世界重分配。至少德國宣傳部長的表示是如此。哥培爾之談及世界重分配的罕有的時機，並不僅僅出於偶然。「重分配」——是煽動家的社會主義的老理想。重分配，不論是以富人為犧牲品的國內重分配或以失敗的敵人為犧牲品的國際重分配，其觀念總是一樣的，都是那種想入非非的「均分」觀念。

魏馬共和國 (Weimar Republic) 第一個使用「促進內部革命」這個政治手段；它現在已成了納粹政權對外政策的精華。這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革命的，世界重分配和創造一個日耳曼大生存空間；在那個大生存空間裏，每個人都可以有一份權利，一份財富。國社主義給它的政治行動發明了許多藉口，但大家都可以很明白地看到，隱匿在這種種政治行動背後的，是虛無主義革命。

打開天窗說亮話，這種累積支配權和權力的衝動，這種浩瀚無限的動力主義對外交策，不過是希望達到無政府主義狀態的表現而已。那不幸被暗殺的巴本祕書愛格·瓊（Eager I. Jung），在幾年以前，就在他的平民政治論中說：「西歐文明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他以為法西斯主義只在形式上約束無政府主義，而實際上却不然。墨蘇斯基上將在論到國社主義的時候，也向他表示這同樣的判斷——法西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只換了一個外殼，但並沒有真正的不同。世界重分配的要求，已不再能代表一個民族爲求生存空聞的正當願望了。日耳曼民族動員一切資源並不是爲了要治好那暫時的創傷。動力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靈魂，它的極端表現不是結束革命而是完成西歐文明革命。這就是國社主義的主要目標。

走向無政府主義是創造新秩序的第一個階段，而西歐文明却想以保守的，進化的過程，向較高的形式發展，這兩者之間沒有妥協的餘地。時間不能把這兩個傾向合攏來；它只能使兩者的距離愈來愈大。動力主義對我們頭腦的廓清和態度的決定實有不少裨益。

在我們德國人看來，結局是很簡單明瞭的。每一個還能爲他自己轉轉念頭的人，都一定知道國社主義在領導我們向自取滅亡的路上走。國社主義革命的對外政策，會不可避免地挑起一場使民族精疲力盡的戰爭。我們試問，國社主義那浩瀚無限的目標和革命手段究竟能給民族帶來什麼永久的利益？即使第三帝國完成了世界重分配，即使在更多的成功和最後勝利以後，它建立了它的支配權，但從事情的本質上來說，這不過是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對被征服領土實施永久的軍事佔領而已。但軍事佔領力總有一天會衰弱，那時德國就難逃必然的結局。這種結局大概會比權力的急速增漲來得更快。因爲日耳曼民族所負擔的稅已太重，各種各式的訓練已使它精疲力盡；在賽跑開始以前，它便會生起病來。

第四章 向最高權力及最高支配權邁進

技術及戰術

讓我們來考查一下希特勒在他一帆風順的路上所採取的技術和戰術。這幾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跡。一個幾乎被解除了武裝，擁有幾百萬失業工人，被網羅在條約制度的法網裏，動不動就要受到制裁的危險的民族，僅僅在六年之後，已一躍而為無人敢向之挑戰的歐洲一等軍事強國。她撕碎了一切條約，她在世界帝國和最高支配權的撞擊中無瑕可擊地屹立着。這的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小覷的一個成就。

德國之所以能獲得勝利，不成問題是由於下列種種要素：一個堅決，執拗，富於彈性和警覺性的意志；明確果斷的熱忱；高明的破壞天才；比對手更能忍受各種磨練的強健的神經；一種善於占下的天賦；一種可以隨時發動去突擊敵方的衝刺力；一種抓住每一個弱點最微小的象徵的準備；一種不允許人家有任何喘息餘地，不承認任何法規的，固執狹窄的胸襟。但要是對手不準備讓德國恢復元氣，並且只要對那種恢復元氣的手段加以幾次抗拒，那末，這一切要素就無法完成它那偉大的成就。我們可以用事實來說明，德國之所以能迅速地獲得領土，完全是由於她的對手自動放棄陣地之故。希特勒老是可以找到一個已經成熟的形勢。

但這是完滿的解釋嗎？我以爲還差得很遠。希特勒真正的成就，不是因爲他能認清德國對手的真正弱點嗎？不是因爲他能認清他們的權力的虛假嗎？這不是他的成功和正確判斷的祕密嗎？日耳曼民族並不願意戰爭，革命，或作任何有關「動力主義」的事情。它需要和平與安靜，正像其他一切國家的羣衆一樣。但在全部歷史中，一切領袖民族的成立，不是因爲有一個能抑制羣衆，能抑制他們天然的和平主義傾向的上層階級存

在的緣故嗎？西歐民主國家沒有這樣一個能控制她們的民族的上層階級，不正是她們退出世界歷史創造者地位的象徵嗎？我們可以很恰當地說，對這件事實的認識，正是一動力」民族的主要出發點。」「動力」民族所以能作強有力的突擊，只不過是因為有一個人能控制對外政策的技術和戰術，能利用手頭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政治形勢作敏捷的處置而已。在外表上看來，希特勒的行動顯然是違反自然，違反一切可能性的；但他老是做得有聲有色，好像真能抓住民衆追隨他，爲他工作似的。

這個解釋並不足以使他的功勳減色，並且也還不是：一個圓滿的解釋。把希特勒的成就完全歸功於優越的技術是一個膚淺的錯誤，因爲它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國社主義自有它非常重要的戰鬥手段，但要是一般政治形勢和道德形勢對它們不利，它們就不一定會得到成功。霍斯浩佛以令人驚異的坦白說，「在各國的和平鬥爭中」，從「政治開發」到「武力解決」，德國都有簇新的「排擠方式」，在「擾亂民心的道德戰中，也有簇新的武器和前人所夢想不到的新宣傳方法」。

霍斯浩佛認爲「等待機會，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作一次出人意外的突擊」，在野心

勃勃，目光遠大的德國對外政策，是一個特別有效的手段。他常常引用布魯的格言：「誰知道等待，誰就能得到一切。」新政策隨時隨地都在虎視眈眈的守候它的干涉機會。它隨時都可以出來干涉，不論是否能找到一個動聽的理由。它也不怕自相矛盾，如在殖民地問題中所表現的一樣。它的基本信念是只有不斷的活動，才能使世界各地的革命進行不息。所以它將抓住每一個延長政治不安的機會，因為它知道，即使是最遙遠的問題，也會和它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它知道這種不安至少可以加快舊秩序的總崩潰。在德國的新政策看來，沒有一個政治問題是和它無關的。每一件事情對它都有意義，都有重要性。它不能宣佈它和世界任何部份或任何問題無利害關係。它的工作是無所不在的，它要使每一個政治問題向大轉變的方向走。

在奧大利事件的處置，尤其是捷克斯拉夫問題的事件中，即使是那些對國社主義沒有多大認識的人，也可以明白地看出第三帝國的戰術手段來。她最初要求這個，接着又要求那個，到最後關頭，她就要求一切了。自國社主義存在的第一天以來，它的手段總老是這麼一套。在那些熟悉這種手段的人，奧大利事件和捷克斯拉夫事件的解決，都不

足引起任何驚異，除非它們的驚異是對其它有關方面而發的。孤立各個問題，把它們和可能的糾葛隔開，把每個問題分成幾個階段，並且不斷地宣稱所達到的階段已是最後階段，佔領一個陣地後立刻又開到次線上（我們只能用軍事術語來形容那種過程），把所有的兵力集中在一點——這一切都是衆所共知的戰術要素。表面上的目標每次雖然不同，但你決不能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因為真正的目標是決不提及的。唯一令人可異的事情，是這一切詭計和舊調重彈，居然還沒有失効。戰術陷穽雖然老是那麼幾個，而國社主義的對手却依舊會不斷地被引誘到裏面去。雖然希特勒曾親自說過：「誰來談判，誰就失敗，」而且事實也早就證明是如此，但她們却還要去和國社主義談判。希特勒常常在談判中突然抬高價錢以困惑他的敵手。他隨時隨地都準備掠奪，從不讓他的對手處於主動地位，從不允許他自己降於防禦地位——這一切詭計都是一個個圈套，惟一的目的就是準備把對手驅進來。他準備冒任何有勝利希望的危險。我們可以說，在希特勒未來的事業中，已經可以適用危險遞減律了。獲得一分利益，便減少二分未來的危險。

但在這一切戰術之中，含有那些革命的成分呢？

我們首先得把希特勒自己發明，只有他一個人能施用而旁人難於摹倣的，純粹的個人技術和這些革命戰術及破壞戰術的主要實際原則分別開來。他的個人戰術就是無限的彈性，機巧，以及那種隨時都能找到一個問題的中心並給它一個解釋的天賦，這種種技術建立了他在黨中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使他有資格成爲他手下那些英雄俠士的教授。他具有鐵一般堅決的，無情的手段，極力掙脫他那傾向懈怠，安靜和妥協的本性。他無疑地具有能等待適當時機的天賦，這種天賦常常被人誤解爲不堅決和不活動的表現，他對一個問題簡直沒有能力作決心，直到內心的呼聲向他呼喊的時候，他才覺得適當的時機已經到了。他有兩種相反的性質，一種是非常冷靜的計算能力，一種是無理性的直覺天賦，他能革命地加以調和。只要他的直覺天賦不來，他的技術就會弄得毫無結果，他就犯錯誤。而驚醒他這種性質的，總是一個敵人的反對，它喚醒了他所依賴的優越感和那種把週圍人物看做「侏儒」而把自己看做巨人的自信心。把油漆匠希特勒造成現在的希特勒的，就是他的對手，他的「黑色動物」(Bête Noire)，民主國家，和那些循規蹈矩，尋求安樂的「可敬的」人民，要是沒有這些東西，他到現在一定還是一個一文

不值的油漆匠。只要是看見邁希特勒爲了談話中的某些小爭執，怎樣變得面紅耳赤，手舞足蹈，聲嘶力竭，藉此擺脫他的愚蠢昏迷，以便發些言論的人，只要是看見過他爲了要打破他心靈上的桎梏，怎樣變成莊嚴肅肅或狂喜大悅的人，一定會知道，使他在大事情上成功的，也決不僅僅是優越的技術和冷靜的計算能力，他需要情感的激發來維持他那猛烈的好鬥性和獲得他那每一個人——不論是外國政治家或德國公民——遇到了都要屈服的建議。

國社主義政策的革命也是如此。革命的成分並不在於武力的使用，使人陷於絕望的，機巧的威脅手段，直接行動或「既成事實」這種種肆無忌憚的技術，而是在於推動這些方法和手段的單純的目標。德國的保守黨黨員和民族主義者說，國社主義並沒有什麼可以大肆攻擊的地方，它的手段是無可非議的，某部長就曾經作過這樣的表示，他們想以此來辯護他們對國社主義的投降，但大體上說來，國社主義對德國還算是合適的。國社主義造成了幾個出色的功勳。即使它在對外政策上的大部份工作，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也不能加以酷烈的反對，因爲德國所處的境况是那樣的困難；但它的總路線却走錯了。

結局它總會弄得毫無結果，並且將生出無窮的禍害。

它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件件都帶着革命的破壞精神，件件都是在揭破「假」神和「錯誤」制度的假面具。這種過程甚至要繼續到把舊秩序的每一個假面具都予以揭破，使無政府狀態全部出現的時候才罷休，那時世界上就只有萬世不滅的「生物」秩序了。這不是一個偉大的創造精神所做的建設工作，而是一個破壞過程的累積。希特勒主義政策就以這種「揭面具」過程爲生；它的革命精神就在不斷地發現和揭破新面具上。擺脫錯誤的觀念和錯誤的原則當然是一種可以欣幸的事情，尤其是在西歐列強自吹自捧的政治觀念下屈服了多年的德國人所該欣幸的事情。但國社主義不但僅僅要摧毀這些觀念；並且要摧毀每一個精神秩序的每一根纖維，阻止再有任何新的精神秩序成立。它成功的祕密就因爲它的對手心甘情愿的對這個表示了領受。西歐列強退讓的原因，是由於她們已漸漸喪失了一種本能的感覺：不相信她們自己的行動是正義的。

要是以爲知識的逐漸增進和判斷的逐漸成熟會使領袖修改那種種把國社主義運動推動到目前這步田地的觀念，這完全是一種毫無理由的推測。西歐列強想指揮國社主義，

想馴伏它，給它種種變好的機會，並根據這些理由避免和它發生一場最後的鬥爭，尤其是一場使它大成問題的道德戰爭，在這種種努力的背後，存在着一種自做自大，輕視德國的心理。在阿爾及爾會議（Algiers Conference）時代，英國全權代表尼古爾遜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就曾發表過意見，說德國是在演一種雙重把戲，她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自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以來，德國的對外政策也引起了同樣的批評和解釋。作這種論調的人，以為要緩和德國的革命，就必須給德國以友誼的幫助。但在威廉二世統治下的德國之所以沒有固定的目標，是由於衰弱和缺乏固定的政策，可是現在她却已有了小心考慮出來和有系統地追求的戰術。德國現在的目標所以不確定，惟一的理由，是因為它是不確定的。

希特勒的勝利

要是你要求一個德國人，即使是一個對國社主義政權其它方面批評頗酷的德國人，

給納粹政權的對外政策下一個批評，他一定會這樣來回答這個問題：任何其他政策能這樣完全地摧毀凡爾賽和約的每一根纖維嗎？尤其是在這樣短的一個時間內，以這樣兵不血刃的手段創造了一個日耳曼民族歷史中空前團結的國家？這不是一個出色的作爲，一個有歷史意義，有世紀重要性的功勳嗎？一個政權，要是它能做出這樣的成就，那末它的一切就都該得到寬恕。所有的犧牲，所有的壓迫，以及自由的喪失，在第三帝國這六年來的成就中都證明是正當的，這是一個最狂放的夢想家都預料不到的成就。他會這樣向你爭辯。

國社主義政策能給處在一個不能忍受的條約狀況中的日耳曼民族以各種重要慾望的滿足，我對於這一切成就自然也同樣的表示讚賞。我們這兒所考慮的，並不是民族政策的本身是否正當，而是它的手段和它所下的限度。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能否稱國社主義政策依舊是一個民族政策？目前和未來事件的發展，不論是否有利於民族或僅僅是在建立一個革命運動的權力，但終究它必然會妨礙和破壞民族。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間那種戲劇式的事件，明白地揭示了希特勒所航行的方向。要是戰爭竟得倖免

（要是戰爭發生，德國在初步的勝利以後一定會失敗），那是因為德國的對手甘願退讓的緣故，而那種退讓是出於德國人的理解力之外的。軍事準備的不充分或許是也是西歐列強退讓的一部份理由，但當然還有其它種種理由，這些理由不是國社主義者所能懂得的。但我們可以確定一點，就是希特勒沒有去計算——老實說，是拒絕計算——一個反德大聯合陣線的實際形勢。他盲目地衝到了一種形勢裏，在那種形勢裏，只有對手的和平願望才能把她拯救出來；在那種形勢裏，他把十三張道德王牌都送到了對方的手中，使她們能更容易動員全世界來反對德國，如在捷克斯拉夫事件時，一萬萬五千萬蘇聯人民就隨時可以拚德國之背。

一個具有希特勒的過去的人，一個生活在怨恨和復讐氣氛裏的人，一九三八年秋季的勝利的確可稱是偉大的了。大不列顛的首相三次登門造訪，不久以後，除了蘇聯以外的歐洲一等強國的四個政治領袖又到慕尼黑去慶賀他的勝利。中歐最後一個民主國家，那些在凡爾賽造成的國家中的模範者，雖然依舊在地圖上存在；但却已不再能算做一個軍事因素，因而也就不再能算為一個政治因素了。這是在接受德國公正的民族要求和服

從民族自決原則的外貌之下完成的。

僅僅在六個月以後，德國的領袖就用一個他所愛用的「閃電突擊」佔領了那個國家的首都。他把那些又大又富庶，但沒有日耳曼居民的區域併入了德意志帝國，把那個國家的其它部份送給鄰國或歸到他自己的保護之下，只留給它們一個獨立的陰影。在六個月以前，他還會莊嚴地保證過這個國家的獨立和她未來的領土完整，但現在他却不顧一切的幹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帝國會議開幕以前，他公開地宣稱說，他在給那些保證的時候，就已經決心要造成這個新鮮的合併的了。那並不是爲了民族自決權，或是爲了要符合族國原則，而只因爲那個合併能適應日耳曼民族爭取「生存空間」的需要——促進那個步驟真正的原動力是她的權力追求和她那想成爲世界主宰的帝國主義野心。

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勝利。希特勒在那次演講裏計算他在捷克斯拉夫所奪得的軍事擄獲品，竟比二十五年以前最著名的勝利戰爭所奪得的數量多了許多倍。並且使那個勝利錦上添花的，是因爲它是兵不血刃地獲得的。

但這個勝利還有另外的一面。很明顯的，佔領布雷格 (Pezze) 這一個最後的行動，已把保持和平的慕尼黑協定訂立時的皆大歡喜一掃而光，憎惡德國的情緒重又活躍起來。一場聯合反對希特勒的大戰那時雖然是避免了，但道義上的信用已為協約國所獨有。當希特勒驅車馳入布雷格那滿地白雪的街道和走進古老的拉斯金宮的時候，他的勝利已經是道義上最大的失敗了。道德王牌已落在對方的手裏。他已造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錯誤，並且已摧毀了日耳曼民族的前途。

這是必要的嗎？這是不可避免的嗎？這對日耳曼民族有重大的利益嗎？這不是在誇耀德國所追求的只是權力和戰略障地，德國的「領袖們」願以德國的康寧和前途作代價去爭取它們嗎？這些人以前說，日耳曼民族需要作生存鬥爭，需要自由活動和發展的地盤。他們不是犯了一個最危險的錯誤，不是把西歐列強訂立慕尼黑協定時的和平志願看作懦弱和恐懼嗎？難道他們不知道民主國家之低聲下氣並不僅僅是爲了缺乏決心嗎？

德國對外政策的整個「生物」基礎正像「地理政治」那頭木馬一樣的中看不中用。英法兩國並不真正已「讓位」。兩大民族或許會因種種顧慮而暫時忍氣吞聲，但日耳曼

民族應該比其它各民族更明瞭這種顧慮會多快被更生的軍力一脚踢開；那時候，那兩大民族便會以一副大不相同的面目出現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到來的危機並不是最後的一個。而慕尼黑會議以後開始出現的一個大聯合陣線的象徵也不是最後的一個。德國自今以後得把這個象徵牢記在心。這個聯合陣線或許只在最後關頭才會組成。德國心目中的同盟者和友邦或許也會包括在內。誰都不會以為她的對手不能採用國社主義的驚人手段。那時德國除了投降和拚死一戰以外，便沒有第三條路可以選擇。而投降就等於永世不得翻身。向最高權力和最高支配權推進的政策，犯了一個最危險的誤解，它沒有認清兵力的分配狀態和有効兵力真正的性質。

危
機

自從此書德文本的第一版在一九三八年秋季問世以來，政治形勢已有了很大的變

化。事實證明我那時對事情可能的發展所下的推測是正確的。我說：「希特勒或會向東南推進。在『劃一』斯拉夫的『制度』以後，他就可以威脅波蘭和匈牙利的側翼，並且有了向烏克蘭推進的工具。他將使旁的國家難於把這些地方造成一個『衛生地帶』，而且憑了在立陶宛和芬蘭的活動，他就可以推倒德蘇之間的『中間歐洲』這根底柱。但因此而貿貿然加以一個假定，認為他的行動只限於東歐和東南歐，却是毫無理由的；他或許會向西發展，利用波蘭的中立，把法國完全包圍起來，使她無動手的餘地，這種行動，也有同等的可能性。他或許會去攻擊波蘭本身，以便修正波蘭的疆界，改善戰略形勢，收回不能由其它任何海港來代替的但澤。爲了預防各國的進攻，波蘭，比利時，和丹麥或許會被佔領，而被迫和德國成立密切的同盟。爲了使德國兵力能自由活動，他或許會去孤立英國，並且把她逐出歐洲。」

除了那些依舊在夢想國社主義對外政策能漸漸成熟和轉變的人們外，布雷格的佔領和波希米亞及莫拉維亞的「併入」德意志生存空間，實不足引起絲毫的驚異。世界一般的輿論，以爲希特勒這個步驟是他個人一個極危險的錯誤，但是錯了。這個步驟是他的

對外政策總路線中的一步。這個步驟惟一能使人驚異的事情——至少是國社主義者所驚異的事情——是國外的反響。國外的輿論終於開始明瞭國社主義的實際目標和它的戰術手段了。但國外的反響並不能嚇住國社主義者；他們僅僅只懊喪他們的前途多了一些困難吧了。沒有一件事情，甚至世界大戰的威脅也不能嚇住他們的進程。這大大地增加了戰爭的危機，那被慕尼黑協定僅僅消除了六個月的危機。或許在未來阻止性的戰爭中，組織反德大聯合陣線的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它至少可以限制戰爭的時間和減少戰爭的犧牲品。

我們可以確定地說，希特勒有許多增進權力和支配權的機會；但他對手的防禦機會却並不較少。主宰了捷克斯拉夫並不等於主宰了世界。作爲一個航空根據地，波森並不比布雷格離柏林更遠。打破了捷克斯拉夫這個「外圍碉堡」並沒有消滅其它各點發展成同樣堅強和同等麻煩的防禦點的可能性。德國的困難也在增長——那是不能用暴力消除而只能用卓越的領導才能消除的困難。我們不要忘記，德國人並沒有結黨營私的天賦，而在德國統治下的斯拉夫人却是創造革命詭計的大師。

西歐列強的企圖大概也要失敗。真的，希圖把德國網羅在一塊方便之地，使她自動地向東南歐進攻是一個妄想。要想使德蘇兩大軍事強國和革命強國互相又住喉嚨而同歸於盡，想用這種方法解除西歐的威脅，的確是太簡單了。

波蘭未來的政策有很大的重要性。她會不會參加那假定的獨立國家聯盟，在適當的時候成爲一個重要的軍事角色呢？關於這一點，一九三八年秋季出版的此書德文本中就提及過。希特勒或許可以很容易地強迫波蘭在聯合進攻蘇聯或蘇德新瓜分之間選擇一條路。一九三九年三月，波蘭方面曾揭露德國向波蘭提出的一個建議，希特勒要波蘭和德國聯合進攻蘇聯，並分享收獲。這個建議和但澤問題正巧在同時提出。很明顯的，德國無論如何不願意依照貝克上校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的演辭中所提出的原則，給但澤一個適當的補償。德國要是最初就宣佈對波羅的海諸國及東北歐並無利害關係，那末，米爾就夠壓足波蘭的慾望了。但自布雷格被佔以後，波蘭就明白希特勒決不會讓德波真正均分利益，他的一切許諾和建議，不過是利於他下一個舉動的戰術狡計而已，要是給他一個最輕微的機會，軍事強國波蘭就會遭到捷克斯拉夫同樣的命運。

聯合反蘇的建議還附帶有一個條件，假如德國和西歐列強捲入戰爭，波蘭應該保守嚴格的中立。這是一個露骨的要求，因為波蘭一定會明白，要是德國在那個戰爭中得到勝利的話，她就落在德國的掌握之中了。布雷格被佔以後，德波關係已大為改觀，已不再像一九三九年二月時那樣僅僅是單純的德波關係；那時德國還沒有真正得到和蘇聯聯盟的機會。英波諒解成立以後，波蘭得了一個新的機會，她又可以重新去追求她那創造一個獨立的聯盟的政策了。

見克上校在一九三七年旅行到布查理斯特的時候，曾訓令他的駐德大使發表一篇「對懸案的一個現實的觀察」。那篇文章以為波蘭應該對時機的需要多加注意，現實的觀察已開始在代替過去那些抽象和模糊的概念。我們現在已踏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新階段裏，一切事情都隨着對外事件為轉移，新的形勢正在發展，我們不必拘泥於固定的政策，而應該利用每一個到來的機會。誰都不能再有餘暇去作不着邊際的空想和幻夢。「國際合作的最高理想和現實」的區別，並不是在暗示對國社主義投降。除非今日的德國是一個十足的婊子，否則在貝克上校這樣冷淡的言辭中，是決不能感到一點點對

哥培爾那種自鳴得意的「世界重分配」革命表示親熱的意味的。東歐和東南歐諸民族，決不會自動地和這個德國一起前進；要是它們終於和她聯合，那只不過是想暫時逃開侵略的危險吧了。希特勒的保證的價值，在波蘭是婦孺皆知的了。

在此書的德文本中，我曾指出一種危機，就是當德國的形勢更加困難的時候——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她或許會突然面對着一個異常可怕的聯合陣線。她的最高權力那時會變成最大的困惑和迷亂。這個聯合陣線現在已成了一個政治上最最重要的現實。這個聯合陣線的骨幹是一個新的法蘭西，希特勒會預期它會革命地瓦解，而事實上她却大大地恢復了她的元氣，幾乎成了一個復活的民族。這個聯合陣線的另一個領導者就是轉變了的大不列顛，她已從漠不關心的狀態中醒來，拋開過去的傳統政策，正在加倍地努力於龐大的重整軍備計劃。國社主義的「哲學戰」和「普遍的不安戰術」將在這兩個民族的身上得到正巧和目標相反的結果。誰都不敢在今天冒險斷定法蘭西是一個垂死的民族和不列顛是沒落的帝國（譯者按：法蘭西已證明是一個垂死的民族了，但誰都依然不敢斷定不列顛是一個沒落的帝國。一個新的聯合陣線，英美蘇聯合陣線，正在醞釀之

中，它或許會突然出現在德國前面。）

波蘭已採取明顯的反德立場，加入了這個新聯合陣線。中立諸小國鑒於和德意志帝國接近的危險，不得不謹慎從事，在戰事爆發的那一天，她們將無疑地和民主國家站在一起；她們至少會被國社主義侵略的壓力趕上這條道路。

最後，我們還得談談美國，羅斯福總統已在建議和平的形式中明白地宣佈，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美國物質資源，在任何緊急事變的時候，將聽憑德國的對手使用。任何巧妙的曲解都不能遮蔽羅斯福要求保證三十個國家的福利的那件事實，希特勒將因美國的態度而處在一個困難的戰術形勢之中，他將被迫第一次接受對手的主動而處於防禦地位，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新的，或許是嚴重的形勢。

希特勒很可能會表示願意退出這種形勢，在一大堆漂亮的辭句下，接受和平。西歐列強或許會因此作些許的讓步，但那些讓步大概是無關緊要的，而且大概也不夠使即使到了那步田地的希特勒滿足。在這種場合，國社主義大概會後退幾步，而這種後退的目的，就在於以加倍的力量重新再來攻擊。但獨裁者所愛用的驚人戰術已大大地失去效用

了。希特勒懷疑西歐列強對目前的重整軍備過程能忍受多久，而事實上最重要的問題，却是在德國能忍受多久。

事情大概會這樣發展：希特勒將不顧新的大聯合陣線和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而僅僅作一個短時間的戰術意味的中止，接着，就開始一次新的，依舊有成功可能的閃電突擊。國社主義的領袖們似乎已沒有能力恢復和平政策及經濟合作，即使西歐列強半途而廢，他們也是無能為力的了。國社主義政權現在已成了它自己的權威制度的囚犯。它在國內不得不用暴力維持它的政府，在國外也同樣的不得不作支配權的追求。它是循着它的生存律發展的，恐嚇或好意都不能改變它的路線。

因此，重建和平的惟一機會就只有推翻國社主義政權。當然，西歐列強是根據這個原則行動的；她們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看日耳曼民族究竟是否願意換一換它的領袖們。整個民族要對它政府的行為負責的那一天終是會到來的。西歐列強對德國的態度無疑地有相當的僵硬，新的聯合陣線將從它目前的守勢轉為攻勢，將送出一最後通牒，那個最後通牒的目的並不在征服德國，而在於要求德國對和平，裁軍和某些佔領區的撤退加

以保證，那個時候似乎已不遠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民主國家的地位並不宜於支持那永久動員的巨大負擔。軍備費的龐大支出，使她們不得不至少考慮到心理戰的使用。她們可以憑了優越的物質資源，也來採用一下國社主義者心愛的威脅戰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那個時候來臨的時候，納粹帝國主義和日耳曼民族之間，恐怕就不能再有所區別了，日耳曼民族將不得不償付納粹帝國主義的放浪生活所累積下來的全部帳款。

對德態度的鹽化，也可以從西歐列強對德國爭取「生存空間」——「生活地盤」——的估價中表示出來，英國過去認為但澤之歸還德國是頗公平的，因為從但澤的民族性看來，直到現在它無疑地還是日耳曼的。但國社主義的「生活地盤」那個新政治學說——這個學說在分割捷克斯拉夫時作過實地試驗——却使英國的態度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因為從「生活地盤」的觀點看來，一個沒有出海通路的國家，不可否認地是無法生活的，那就是說但澤應該屬於波蘭。

上述的種種危機就被國社主義的領袖們認為是起早作戰的理由。希特勒以為他手中至少還有幾張王牌。只要西歐列強的政策暫時稍現軟弱，他就會很快地把這幾張牌打出

去的。照目前的情勢看來，國社主義政權動手的起點還是在但澤。但澤問題即使和平解決，也不過是暫時的而已。問題不是在於但澤是一個日耳曼民族的城市，也不在於但澤的四郊都是日耳曼農民，而在於它是維斯杜拉河與但澤灣的入海口，是極端重要的戰略據點，根據國社主義的長距離目標，又是掌握波羅的海所不可缺少的海軍根據地和進攻波蘭所不可缺少的基礎。

國社主義政策的一場無結果性也可以由這一個問題上看出來，在這麼多的成就之後，但澤政治問題竟可以使過去七年來的全部工作都有毀於一旦的危險。理由是希特勒不會能打好過一個真正偉大而穩固的成功基礎，他不能使德國的東翼得到保證，因此他無法可以在西方大胆的幹；他也不能宣佈對東歐無利害關係，因此他不能在東歐進行一個真正建設性的政策。其實，只要給東歐諸國的主要需要和政治獨立的要求稍稍予以滿足，她們的中立和協助是一定可以得到的。但希特勒不能執行一個真正創造性的政策；他的戰術天賦都消耗在那些只能產生類似成功而非真正成功的神計妙算之中，如德波協定和佔領奧大利及捷克斯拉夫那種擊盪般的強暴行動。國社主義上台的時候，德國的

對手沒有能力組織一個反希特勒的統一陣線；現在它已被國社主義本身所推動的政治進程造成了。所以用國社主義者自己的標準來測度，他們過去的全部精力也都是虛化的。

但在目前，使人感到興趣的問題是希特勒的權力究竟有多大，他是否可以不藉政治詭計而用軍事手段逼迫東歐諸國保守中立？這或許是如此。在慕尼黑協定以後，希特勒以為只要用一些空泛和不着邊際的保證就可以贏得那些國家的中立，用壓力和許諾就可以獲得必需的原料品。在一九三八——三九年冬季的第一個月中，國社主義的領袖們，曾幻想他們不必把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拉夫的剩餘部份併入德國的同盟組織，而當時就可以確保東歐諸國的中立，向西歐作斷然的突擊。德國給東歐諸國的保證，是她們能分享德國將來獲得的殖民地，並且給猶太人問題——某些東歐國家的一個極困難的問題——一個「總解決」。

但希特勒的暴力政策在這兒第一次作了一個錯誤的估計。希特勒用在外交上的突擊和處理內政的手段差不多——只遏住了某些問題，但並沒有把它們解決。他們依舊不斷地在表面底下活動着。捷克事件中所表現的不守信用，已成了德國的致命傷。在未

來的戰爭中，東歐諸國的中立是不可靠的，國社主義政權在向西歐有所動作之先，不得不再用它那殘酷的暴力政策包圍波蘭，把捷克斯拉夫全部結果。但這却無論如何與包圍法國和把英國逐出歐洲政治舞台那兩件事相抵觸。由於不能加speed東歐諸國的中立談判，由於不能在地中海和北非作種種活動以切斷英法和她們殖民地間的聯系之先獲得這種保證，國社主義政權不得不把兩個戰略計劃同時並進。這使它的政治行動陷入了混亂之中。所有互相矛盾的問題都同時呈現在希特勒前面，他於是就只能隨機應變了。布雷格的佔領雖然解除了各方面的威脅，但那個突擊也摧毀了把他的問題逐個予以解決的機會，在希特勒，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失敗。

話雖如此，但希特勒還可以動，只是冒着非常可能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吧了：他可以從地中海和西班牙威脅英法，把他的突擊作一個閃電式的轉變，藉此不斷地改進全般形勢，因為在行動的迅速和堅決上，他似乎還處於一種獨佔的地位。據波蘭的國社主義者觀察，但澤的佔領並不能使走廊處於難守的形勢，但它會使波蘭立刻改爲守勢，退到布格——挪里夫——維斯杜拉這一條陣線上（Bug—Narew—Vistula Line）。德國可

以向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作驚人的突擊，在聯合陣線還不能決定應該怎麼做以前，就達到所希望的結果。德國可以藉此獲得原料品，佔領有戰略重要性的南斯拉夫。西歐列強還來不及應付這個新形勢，波蘭已經被從喀爾巴阡山（譯者按：Carpathians 係波蘭和捷克斯拉夫交界處的一重山脈）來的兵力挫敗了。軸心國家那時就有充分的資源可以用來向西歐突擊，並去佔領荷蘭，比利時，丹麥，再加上地中海上的活動，德國又可以獲得一次新的勝利了。

不可否認的，憑着迅速的行動，希特勒依舊還有某些成功的機會。他將毫不猶豫地利用它們。要是西歐列強對他的閃擊不讓路，他是不惜冒世界大戰的危險的。德國依舊想奪取法國北部的某些領土；希特勒過去所啓示的長距離目標一個都沒有放棄。但要明瞭國社主義的全部目標，我們還必需瀏覽一下最近的文獻，地圖，訓令和希特勒青年團最近六個月來的出版物，或霍斯浩佛將軍最近的文章。希特勒的目標，第一，是在把歐洲各民族，不論是過去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邦，不論是東歐「半條頓碎片地帶」的殘屑，都要以各種被保護國和同盟國的姿態圍繞在德國週圍，造成一個宗教性質的組織；第

二，是削弱大不列顛帝國，建立非洲殖民地，突入南美和太平洋；第三，是和蘇聯聯盟或合併其領土，最後，成爲世界權威。

但雖然有這種理想，希特勒的政策却已經被慕尼黑協定阻住去路了。這個協定雖然使西歐列強在表面上受了損失，但實際上却產生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反希特勒效力，尤其是使德國國內對他的感觀大爲改變。要是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就照他那時的意向去奪取布雷格，佔領全部捷克斯拉夫，深入羅馬尼亞，以喀爾巴阡山與波蘭爲界，那末，他的一切困難都早已克服了；東歐諸國即使不和德國聯盟，至少也不得不保守中立；波蘭因爲受了法國態度的影響，或許已參加德國的同盟；希特勒現在就可以掉過頭來征服西歐了。但在目前和未來，這同樣的行動却一定會使德國失敗。很明顯的，英國的政策並不是軟弱和缺乏考慮的表現。

西歐列強最初爲什麼要放縱國社主義呢？我以為他們非常希望德國復興，並且歡迎或甚至在協助國社主義運動，因爲遲早它是會使德國崩潰的。某些政界人士心目中最可怕的，莫過於德國出現一個保守的，君主主義的政府，一個從戰前的錯誤得到了教訓

，採取緩和的政治目標和政治手段的政府。遇到這樣的一個政府，西歐列強就無法阻止德國支配諸小民族，尤其是東歐的諸小民族了，這些民族不僅會接受德國的支配，並且甚至會歡迎它。但在另一方面，抱着妄誕不經，令人厭惡的人種原則的，革命的國社主義，却會使其它民族退避三舍，即使內部的混亂阻止了德國主宰歐洲的雄心，它也會使諸小國發生極端的惡感。

究竟這個協助國社主義的政策，實際上會否被西歐列強採用是無關大要的，要是他們真採用過這種政策，那當然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因為德國要是恢復了帝制的話，經過大戰的教訓，她自然會滿足於一個安穩的狀況而排斥任何帶有冒險性的對外政策。一個復位的君主政體，對於解決德國正營的憂慮一事，一定會接受和平的處理。但在另一方面，國社主義革命雖然遲早會與德國的崩潰一同壽終正寢，但在壽終正寢以前，却先得造成許多許多的破壞工作。誰要是去促進國社主義而拒絕一個溫和的民族主義的政府，他一定是一個不幸的傻瓜，去阻止保守黨黨員以及民族主義者和國社主義分離，以致不能恢復帝制，達到他們自己的解決方法的，一定也是一個同樣的傢伙。目前的進程會使

德國崩潰是已經確定的了。惟一沒有確定的，是那追求崩潰的實際路線和在它手下喪亡的犧牲品數目。

我們可以說，這一切都是必然的。新的問題會一天天的堆積起來，有一天，德國終於會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那時，即使她把進程的方向來一個大大的轉變，也無路可通了。沒有一個革命是能永遠繼續的。「生物」原則不能創造一個永久的制度，能創造一個永久的制度的，惟有那些公正，平等和自願限制自己權勢的原則。最高權力和最高支配權是不能存在的，能存在的，惟有那最高的自由，正義和恢復歐洲秩序的正當目標。

歐洲式的解決

不但德國目前所處的戰術形勢該受指摘；就是那種以橫行霸道的兵力為基礎，想以德國國內現在所實施的獨裁手段建立一個世界帝國的新秩序觀念，也極荒謬可笑，並且是完全不能實現的。這種手段決不能永久維持一個帝國的統治權。「動力」民族所誇耀

的勇敢的新觀念，實際上是老朽和開倒車的觀念，那被斥爲「沒落的權威」的英國，要比它更能適應時代得多。獨裁政權的強暴手段，一時或許可以顯得威風凜凜，但終究這些手段是毫無結果的，並且最後會毀滅它自己。國社主義政策的主要錯誤，在於它重新採用了那幾世紀前就證明不會有結果的陳舊的手段和目標。國社黨以加倍的精力，重新嘗試那過去一再失敗的政策，並以此揚揚自得，好像以爲任何錯誤，只要大得可以，就會成功似的。要是第三帝國想恢復第一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的狀況，她至少該回憶一下中世紀西歐文明的主要原則，那對她倒或許是很有用的，那條原則就是：「限制聯邦的主權的，不是皇帝的權力，而是一種真正的威望，這種威望是這樣的有力，使主權不得不對它低頭」。誰都不能否認，大不列顛帝國的政府是基於自由和同意的，這種建立中央道義上的威望的手段，已使她非常接近理想的國家和理想的社會秩序了。

無疑的，日耳曼民族的領袖們目前的態度，是日耳曼民族二十年來窮極無賴的結果。利用「拚命的愛國志士」去進行急進的革命路線並不足使人詫異，但這決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國社主義的對外政策中，破壞傾向終於壓倒了創造傾向，這有許多很明白的

理由，其中之一，就是那些所謂勝利國家在政治上是太缺乏創造力了。由於這個理由，再加上德國國內的發展，就造成了國社主義現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的革命的對外政策的前提。

柏樂克道夫伯爵 (Count Breckdorf) 答覆凡爾賽條約說，日耳曼民族已準備去迎接它那殘酷的命運，「一個不能在全世界人士面前名正言順地保衛的和約，是會不斷地引起新的反抗的」。叔特曼 (Philipp Sotsidentmann) 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二日說：「凡爾賽條約的結果，會使道德觀念空前的殘酷化。」叔特曼不是一個布爾喬亞的國社主義者，而是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可是他却也稱和約是「一把最可怕、最殘忍的女巫的斧頭，」那把斧頭把一個偉大的民族囚入了牢籠，強迫它自認是一個卑鄙不足道的民族。「我們不能忽略二十年前的事情和目前的聯系。那些事情不但說明了德國目前對外政策的目標，並且也說明了它的手段。我不是在給德國轉移責任，而是在說明因果關係。」

在國社主義執政前的十年以前，德國青年保守黨黨員所抱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要比目前的暴力政策高明得多，他們想以一般的權利觀念促使德國復興，得到一個「歐

洲式的解決。現在他們已逐漸在明白了，他們自己所參與的「民族復興」運動，實際上是一個殘暴的虛無主義革命，是他們自己的理想的否定，這是最使他們驚懼的事情了。

早在穆勒——寇都的德奧關稅同盟計劃時期，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輿論，就已經接受近代的聯邦原則作為解決德奧問題和中歐問題的工具了。兩國的民族主義者都拋棄了日耳曼民族稱霸的觀念，而開始接近聯邦制度的一般原則，以代替那不能令人滿意的西歐民主觀念。我所以要提起這一點，是因為它可以使人明白德國已經深深地陷入了國社主義的行動之中。國社主義者所要求達到或企圖達到的解決，並無補於日耳曼民族的主要需要，即使他們的經濟勢力能深入東南歐，也並不能使那些主要需要得到一點滿足。

德國東進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經濟的，並不僅僅是一個市場和原料來源的問題，它同時也包含着制定歐洲秩序的政治使命。東歐是超民族觀念難於發展的地區。在萊茵河以東，沒有一個民族能成功地組成一個歷史悠久和成熟的國家。當族國原則在十九世紀出現的時候，這一帶地方，除了瑞士以外，沒有一個國家足以抗拒革命的攻擊。甚至組織嚴密的普魯士也不能和族國原則相對抗。俾士麥建立德意志帝國的歷史意義，就在

於把那超民族，超教派的普魯士版收到採取普魯士政體的日曼耳族國之中。在哈布斯堡皇朝時代，國家觀念還很幼稚，那時還不夠籍聯邦原則給國家奠定一個堅固的基礎。國家形式的歷史巨輪在東歐只印上了幾條淡淡的痕跡。西歐在十七世紀時，就建立了超民族的國家形式，但要在東歐建立這樣的國家是太遲了。族國在這兒佔着極大的優勢。要建立一個超民族的秩序，就必需找到一個新的原則，但這個新原則又不得不顧及現存的條件；惟一的辦法，便是建立一個太上制度，作為各族國的名義領袖。德國應該以聯邦原則去建立這樣的一個制度，並要求其領導權。

但國社主義者的計劃，却想以族國原則為基礎，造成一個中心強國，勉強造成一個國家，這完全是與上述的原則背道而馳的。但國社主義如真的實施族國原則，却又和它的本旨相背。因此，國社主義又把它放棄，而代之以人種原則。人種原則毫無科學根據，它只是一個政治詭計。族國原則永遠是革命的，是反對歷史的國家觀念的；它要恢復自然秩序和生物秩序。但人種原則更具有這種特性。所以它決不適宜作一個太上制度的基礎。它不但不能遏制族國基礎的革命性，並且會使它增強。歷史悠久的國家總是一

個人工的創造物，也就是，一個克服了自然的創造物。

國社主義不能給德國對外政策上的各項問題作一個「歐洲式的」解決，因為，作為一個革命的主義，它是不宜於這樣做的，並且它也不能承認正義與自由的不可破壞性。凡是想使它去尋求這樣的一個解決的努力，可以預斷一定會失敗。西歐列強努力想緩和德國的革命，而實際上它却更走極端了。

西歐列強五六年來一向沒有認清國際聯盟的弱點，一向抱着錯誤的政治原則，現在，她們剛從昏迷狀態中醒來，她們之不能應付那危險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武器，是毫不足奇的。不論我們是否願意，總之，只有武力和潛勢力才能使歐洲問題得到解決。要是在歐洲造成一個新的，富有彈性的均勢，或許可以把它一場殘酷的世界大戰的暴發遲延一些時候，但這並不能影響歐洲問題；它們依然會照樣存在，直到每一個問題都得到了它特殊的解決——漸進的或革命的解決。假如是革命的解決，當然還得以無數人的流血作代價。

一次和平的呼籲得伴隨着幾個具體的建議才行。但西歐列強却不處理實際問題而僅

僅想避免用武。她們以爲要有力地阻止「動力民族」的新帝國主義，惟一的辦法，只有向它指明，這種新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復現，它的新姿態是目前的政治狀況和經濟狀況所造成的；大不列顛帝國在不斷的進步之中，阻止了革命和無政府主義的傾向。現在要是以共同剝削爲原則而修改殖民地制度，德國也照樣可以克服那些傾向。或許就是這種觀念在促使英國以最後的努力和德國妥協。但這種努力雖值得稱道，却一定會失敗，因爲國社主義不是一個可靠的夥伴。與其把「有的」民族的殖民地和原料資源讓給「無的」民族，不如把殖民地和經濟資源無差別地公開給歐洲一切國家，這樣倒反而可以消除「有」「無」之間的區別；緩和革命的熱情。

只有在一個公正平等的新制度之下，歐洲才能有真正永久的秩序。因此，要消除革命，只有歐洲各民族共同努力才能成功，決不是那一個民族所包辦得了的。凡爾賽秩序並不是那個能阻止世界革命的理想制度，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德國的復興不能用武力和強暴來達到，却也是同樣的正確。解決歐洲問題的密訣，不是那具有革命天賦的戰術機巧而是中庸之道。要是希特勒將來能把握住中庸之道，能完成他最初所說的「建設性

的和平解決，「那末，我們對國社主義所下的判斷真是錯了，並且，我們應該愉快地承認我們不能認識人性的偉大。希特勒那時真會成爲他所想像的那樣一個偉大的人物了。但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鎮定德國內部的不安，必須放棄強制仲裁，而用自由討論的方式來排解糾紛。必須對那些態度誠懇的反對國社主義政權的對手重歸和好。一個成功的獨裁者或暴君，常常會在最後關頭有這種寬宏大量的行動；但這個德國的獨裁者甚至對他最高尚的對手都毫無寬宏大量的表示。在這些年來，他曾經有過一個與他的對手重歸和好的舉動嗎？他曾經向他的對手做過一個寬宏大量或善意的行動嗎？只有寬宏大量才能達到重歸和好，要是這真能成功，一切現政權認爲重要的一切——暴力，恐嚇手段，不自由，人造的熱情和由威迫所造成的一致——那時都得滾蛋。那時，德國又將允許個人的自由，重新解放思想，言論和行動，解放人類不朽的精神。

但這一切怎麼可能呢？這不是就等於要國社主義下野嗎？這不是就等於停止那可鄙的反猶太主義，停止那合法的，有組織的搶劫嗎？這不是就等於自認現政權的「有機生物」哲學只是一種一文不值的無稽之談，人種原則只是一種攻擊人類和基督教的野蠻武

器嗎？

不！希特勒寧願破壞歐洲和平而不願意結束他自己的「動力主義」。兩者是不可得兼的。國社主義革命在國內只能產生破壞行動，在國外只能產生戰爭和革命。

要是這些年來的壓迫曾給我們某種收獲的話，那末，這個收獲就是我們已由鐵的事實中得到證明，所謂公道正義就是那麼一回事，而暴力原則和權力追求會使我們踏上革命和毀滅的道路。當然，這種認識現在還不普遍。或許那些過去自命負有一種道德使命而在危急關頭會放棄這種使命的民族，在得到這種認識以前，必須經過一個幼稚的「現實主義」的階段。但不論如何，在那些「現實主義者」的眼前，已漸漸顯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新歐洲。或許這整個大陸必須先經過一次波及每一個國家的，普遍的去動亂時代。或許我們還要目睹一個各國累積物力人力逐鹿爭雄的時代。但是，在這走向無政府主義的急行軍途中，各民族遲早總會想到它們自己的歷史和歐洲的歷史，想到西方文明的構成要素——它過去的民族自由。那時，不管你反歐洲的衝擊有多兇，歐洲終於又會復活，並且會永久地屹立着。

這就是國社主義「第三帝國」的政治活動所以會毫無結果的理由。在舊秩序尚有摧毀之處的今日，它或許正適應了政治發展的潮流，能容易地得到成功。但以後，事實將證明它所要建設的一切是不堪一擊的。因為它違反了自然，違反了人類最深刻的本能，違反了歐洲文明的整個精神。

在復興自己民族和創造一個超民族的共同秩序上，沒有一個政府比一九三三年正月的德國新政府有更好的機會。要是強盛的德國不想去支配各小國，而願意用高貴的，政治家態度和她們合作，她早已得到了促進歐洲文明的據點了。它將給德國一個與目前大不相同的，優越的遠景，德國的民族主義者，青年保守黨黨員，巴本的私人秘書愛格·瓊，海倫克洛勃，以及某些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都看到了這個機會。我個人的努力也是想往這方面發展。這不是烏托邦式的努力。但這和國社主義的虛無主義所追求的路綫正巧方向相反。在一九三三年，這個無原則的虛無主義革命之主宰民族前途決不是不可避免的。國社主義用強暴的手段奪得了德國內政外交的決定權。但這個勝利不一定是永久的。即使在今天，我們還可能毅然決然地消滅革命，克服無政府主義的渣滓，重新採

取六年前可能辦到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恢復德國在歐洲的永久地位，避免造成世界革命的大戰。

借書卡片

335.6
2707

01476

奔特勒征服歐洲

到期日	借書人姓名	單位
4.12.	王星臺	
	李少明	

社會部
圖書館

335.6

類別

2707

登記號

01476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

希特勒征服歐洲

(Hitler's Aim in war and peace)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原著者 魯許尼格

譯者 蔣學模

重慶臨江門川鹽三里十號

發行人 許立德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重慶桂林上海香港金華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桂10022

本書由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書字第四九八號審查證

27607
書叢小戰大次二局書代時*

法 國 淪 陷 記

譯 瑞 嘉 董

著 等 室 根

我 是 史 比 上 將 號 的 俘 虜

譯 娜 安 鄭

著 甫 德 契 貝

希 特 勒 遇 刺 記

譯 舫 華 徐

著 "F · E"

世 界 大 戰 分 析

譯 模 學 蔣

著 德 士 福

法 蘭 達 斯 之 戰

譯 娜 安 鄭

著 斯 丹 亞 · K

戰 爭 新 學 科

舫 華 徐

著 氏 名 無

罪 人

羅 吟 圖